晚明七十年

1573—1644，
从中兴到覆亡

十年饮雪/著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1)
- 第2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2)
- 第3节：两位铁腕宰相的PK(1)
- 第4节：两位铁腕宰相的PK(2)
- 第5节：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 第6节：且将剩勇打死虎
- 第7节：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 第8节：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 第9节：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 第10节：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 第11节：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 第12节：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 第13节：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
- 第14节：一个愤青的成熟(1)
- 第15节：一个愤青的成熟(2)
- 第16节：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
- 第17节：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1)
- 第18节：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2)
- 第19节："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 第20节：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
- 第21节：临终前的恩荣
- 第22节：大明的参天大树倒了
- 第23节：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
- 第24节：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 第25节：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 第26节：最悲伤的白发老母
- 第27节：改革家的宿命
- 第28节：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
- 第29节：神宗短暂的勤政
- 第30节：申时行走钢丝

- 第31节：少壮派的价值
- 第32节：政治暴发户被皇帝抛弃了
- 第33节：天下第一父亲的烦恼
- 第34节：宫女中了头奖
- 第35节："国本论"始起
- 第36节：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 第37节：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1)
- 第38节：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2)
- 第39节：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 第40节：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 第41节：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
- 第42节：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 第43节：较劲变成了赌气
- 第44节：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 第45节：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 第46节：皇帝也搞迂回战术
- 第47节：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 第48节：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第1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1)

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

公元1644年一个春日的拂晓，平时肃穆庄严的紫禁城一片混乱，一个中年人带领一名随从，走到城北的万岁山--即今天的景山，找了一棵树上吊自杀。留下一封遗书，上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个人便是当时全球臣民最多的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坍塌了，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照在筒子河上泛起粼粼金波。但这轮太阳再不属于大明，大明的时钟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停摆，皇帝的生命和属于他的皇历一起走入历史，供后人凭吊感叹。

崇祯帝自缢后三百六十年，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景山公园整日熙熙攘攘，游人如织。网上有一篇文章《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流传甚广。那棵树谁也找不到，包括得渔翁之利的满清皇帝，下诏将一棵槐树命名为"罪槐"，也只是一种统战艺术，崇祯究竟在哪棵树上吊这种纯学术问题，对于执政者来说，并不重要。当时北京城混乱如麻，从西北黄土高原打进城的农民军将士，是不会有史官意识的，他们七手八脚把一个看上去尊贵的尸体从树上解下，当时谁能明白自己看到了最重要的一幕历史现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经让他们在窑洞里只能想象的皇帝。等死尸的身份被证明后，谁还能说清楚哪棵树是崇祯了结生命之处？

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实则是想追问促使天子上吊的原因，追问一个帝国崩溃的原因。

这种寻找持续了三百六十余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崇祯为什么要去死，明朝为什么会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见解不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崇祯死时，心里充溢着对帝国诸臣的怨

怒，他至死也不原谅自己的属下。他认为是那帮只拿钱不干事甚至坏事的文官们导致亡国。他的死，可视为殉国刚烈之举，又何尝不可以视为对众臣的极度失望而走上绝路，以死来反衬诸臣的猥琐卑劣。历代王朝，都有兴亡的过程，但国之将亡，君臣关系恶劣到崇祯朝这个地步，真是少见。

没一个文臣闻钟勤王，陪崇祯帝殉国的是一个太监，这是一种巧合，和明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基本格局有如暗契：皇帝和文臣彼此依靠而猜忌，皇帝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私人奴仆太监。

崇祯临死前还那样痛恨诸臣，有其个人性格原因，如刚愎自负、刻薄猜忌，但也至少能说明诸臣确有可恨之处。尽管崇祯自道的"朕非亡国之君"是推脱责任，但"臣乃亡国之臣"则不假。《明史》说崇祯帝"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也非过誉之词，这样一位自我要求严格的皇帝做了亡国之君，不但他自己想不通，后世许多人也想不通。

满清皇帝曾于顺治十四年谕示工部："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据说顺治帝曾经亲自去祭崇祯的陵墓，并失声泣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见李清《三垣笔记》）顺治此番作为，当然有安抚明朝遗民的人心之政治考量，但至少连昔日的敌手，也不承认崇祯是个混蛋皇帝应该亡国，而是对他予以理解之同情。

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的皇帝，和手下的臣子一起把帝国送上了末路，那么一定有很值得探讨的价值。

当我回顾明朝万历帝登基（1573年）到崇祯帝殉国（1644年）七十一年的历史，觉得有许多想不通的现象：一方面人才辈出，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涌现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顾宪成、高攀龙、汤显祖、王世贞、李贽、袁宏道三兄弟、徐光启、宋应

星、袁崇焕、刘宗周、黄宗羲等一大批士林精英，另一方面在危机当前，无人可用，朝廷被一帮城狐社鼠盘踞着。一方面江南等地莺歌燕舞，一派繁华景象，民间经济异常活跃；而另一方面西北农民因饥寒交迫揭竿而起，朝廷财政近于崩溃，无财力应付内忧外患。

第2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2)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表面上，明亡于诸病齐发的绝症。和满清的外战一败再败，辽东几乎全部沦为敌手；国内因为苛政而驱民为贼，越剿越多，流寇纵横全国；朝廷内诸臣各立门户，损公济私。这些急性病和慢性病、外伤和内疾一起发作，纵使华佗再世，也难妙手回春。诚如《明史》所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溃烂而莫可救"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明之亡，有崇祯个人的原因，如性格猜忌苛刻，求治心太切，也有君臣否隔，满朝贪官、昏官太多的因素，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造成皇帝和文官集团彼此怨恨的根本原因，则是从唐以后，支撑中华帝国这间老房子的士人政治，其整体制度一步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制度不改革，几乎无路可走，无论怎样的皇帝，都没办法起死回生。理解这点，我们或许能解开明末的许多疑点：为什么监察制度那样严密而明末的官吏贪腐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崇祯帝诛杀魏忠贤坐稳龙椅后，对太监乱政有足够的警惕，但最后又不得不依靠太监而疏离文臣。

抱着对明亡的种种思考，我尽量用简约的文字，将1573年至1644年这段晚明历史中一个个事关国家兴亡的故事和人物写出来，希望读者能比较轻松地读完这些文字后，对一个帝国从中兴到覆亡之路有个基本的了解，也能在读故事之余，对中国的王朝兴亡以及传统政治的困境有所思索。

但愿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诚恳地希望方家指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上所发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读史并思考历史，不仅仅是无聊而为之的事情。作为唯一文明史没有中断、几千年使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富矿，值得珍惜和挖掘。

第一章 张居正的中兴

明帝国从万历元年（1573）到崇祯帝上吊的崇祯十七年（1644），短短的七十一年里，明朝从霞光满天的中兴，很快就走向了天崩地裂的覆亡。

由张居正主政而带来大明朝十年的黄金时期，开启于一场残酷的宫廷权力斗争。

张居正变法，这场后世看上去很美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密室阴谋、排斥异己、陷害政敌等等种种丑恶的东西，这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面目。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权力场中，道德是很苍白的，玩弄权术、掌握权力是一个政治家必修的功课，不如此所有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只能是空中楼阁。

要以不光明的、甚至厚黑的手段，去建立光明的、伟大的事业，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他们无可选择。

一个政治家要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多么的不容易。一般他要经过过关斩将、淘汰率极高的三级跳：府试加院试取得生员资格；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再赴公车通过会试和殿试取得进士资格，这才算是"释褐"，脱掉平民的衣服换上官袍，开始在波涛汹涌、暗礁密布的宦海中沉浮，时时都可能触礁翻船，时时都可能被鲨鱼吃掉。熬到最后能够进入高层的，那都是些在官场这个八卦炉里修炼到极高段位的牛人。他们要学会等待、忍耐，学会伪装、掩饰，学会合纵连横，拉一派打一派；学会伺机出击，一剑封喉。

高拱是这样的高手。

张居正更是这样的高手。

第3节：两位铁腕宰相的PK(1)

两位铁腕宰相的PK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史》说他"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属于那种牛皮烘烘的人，做他的同僚或下属，基本上会觉得不太舒服。他是张居正的前辈，曾经他做国子监祭酒时（最高学府的校长，正四品），张居正在他手下做司业，隆庆帝还是裕王时，两人都是裕王府邸的讲官。应当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许"，和高拱一样属于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而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然而他"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点高拱所不能及，高手过招，一点差别就会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落败就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他自小便以神童著称，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此后在翰林院等地方坐了近二十年的冷板凳。直到嘉靖宾天，隆庆即位，为隆庆即位前充当过讲官的高拱、张居正等藩邸旧人，全部成为淮南鸡犬，跟着主人扶摇直上，进入权力核心层。顺理成章入阁，但高拱因资历排名在前面，是内阁首辅。

隆庆六年即1572年五月，正当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遽然崩架。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虚岁十岁的小孩，先帝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旧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受先帝顾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担负极大的责任。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身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但这一说法，很多史家怀疑，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是当时的首辅高拱，认为国朝无内官顾命的先例，他和冯保早有过节。文渊阁大学士高仪，性格仁厚而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

如此局势很明朗，内阁中两大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好似火星碰地球，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

冲突是必然的。在万历帝登基前，两人已有矛盾，高拱报复了张居正的恩师、致仕在家的前首辅徐阶，而且对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关系亲密很是痛恨。

结交宫中太监，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皇帝担心内外大臣勾结，左右朝局。但官场上的事情，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没有内应，外廷大臣将举步维艰，因为大太监掌握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时，张居正早就看好照顾太子起居的冯保，百般结交，这个道理很简单，太子登基，陪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太监一定会受到重用。而高拱正相反，他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应当说，高拱这样做，更符合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不许太监干政，是真正的为大明朝考虑。但当时，大明已建国两百余年，太监干政成为惯例，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尊重现实。

隆庆帝在位时，冯保已经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皇帝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不受都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到后来都能左右审判了。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任，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孟冲，可想而知，冯保能不对高拱恨之入骨?

隆庆帝崩驾前，冯保走通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帝下诏驱逐掌印太监孟冲，以冯保代之。因此万历一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廷第一大太监冯保成为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三足鼎立犹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

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明朝在洪武帝朱元璋手里，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学士只是备皇帝咨询的顾问人员。到了中后期，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大学士成为了无名而有其实得宰相。

内阁学士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即替皇帝起草有关军国大事的文书，无意外情况，大学士所拟票皇帝一般照准，因此等于最初的决策由内阁出；大学士所拟的票到了内宫，由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批红，即替皇帝批准草案。这就相当于唐代的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核，没有手握批红太监的配合，内阁大学士很难有什么作为。因此与"外相"内阁大学士相对应，内廷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被称为"内相"。

第4节：两位铁腕宰相的PK(2)

如果冯保这个大太监偏向于张居正，高拱必定势单。对这样的局势，高拱也早默察在心，隆庆帝病重时，双方已经暗中来个回合，相互侦查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曹仲平上疏弹劾高拱。给事中是监察六部九卿的，和监察十三行省、两都的御使合称"言官"，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可到了明朝后期，一些言官基本上沦落成皇帝或者权臣的枪手，说让咬谁就咬谁，说咬几口就几口。曹给谏的上疏中列举高拱十大不忠。--"不忠"是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帽子。可快死的隆庆帝不想自己见列祖列宗前朝局动荡，他还得让首辅高拱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所以他很生气，要求处罚这个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和冯保当然要保护为自己打头阵的先锋，便做了手脚把曹给谏调到京外，异地做官。

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到言官当枪手，难道我就找不到？因为他知道关键时刻皇上离不开自己，一方面上疏要求退休，反守为攻；另一方面授意御史张集上疏攻击张居正和冯保，举太监赵高杀李斯，引来秦朝亡国之祸，嘉靖朝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害死夏言等典故。拿历史说事，中国士人的传统，其所指者谁，昭然若揭。

扣帽子、抓辫子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技艺之一，张居正何等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典故的破绽，说这厮如何把圣上比喻成秦二世？--这一击简直无可抵抗，而冯保作内应，放出风来，说万岁爷爷因为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一下，把上书的张集吓了个半死。

张居正的聪明就在于他并不想简单地报复，去处罚被高拱指使的抢手，而是吓唬攻击自己和冯保的言官，制造一种气氛，让人不给步张集的后尘。

这场风波过后，新皇帝登基，朝局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摊牌的时候。高拱首先发起攻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

的作用，同时，和自己推荐的高仪商量，决定用"两高"同盟来和"张冯"同盟对阵，可高仪看出这场斗争的极大风险，不敢趟这池超级浑水，对高拱说，先生说的不错，所说的都是大丈夫该做的事情。但祸福难以预料，我固然不赞成先生这样做，但也不敢阻止先生。

高拱决定先下手为强，孤身出击，草拟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项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通报给张居正。--同是辅臣，这是必须的程序，抑制宦官是个政治正确的命题，张居正没理由反对，还当面夸赞高拱此举将建不世之功勋。可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后，得到的回答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也就是委婉地否决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干脆图穷而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冯逮捕公审治罪。

到了这个份上，已是你死我活了，冯保必须反击，他向张居正讨主意，张居正说，咱们正好将计就计。

如何将计就计呢？高拱要求限制太监权力的上疏批回来了，上面写有"照旧制行"，高拱说，这样重要的批示为什么不让内阁拟稿？怎么让宦官草拟意见呢？送公文的太监说这是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说了句，哪有十岁的天子能裁决政事呢？

这句话出了大毛病了，冯保马上告诉皇帝。万历帝早慧，一听首辅大臣看不起自己，跑到两宫太后（嫡母和生母）那里哭诉，太后也觉得高拱太放肆了，是犯上欺君。高拱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不久，宫中传出命令，说皇帝召内阁、六部、五府（即掌管军队的五都督府）进去听旨。将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听说后，高兴坏了，以为是要驱逐冯保，自己发起的攻势见效了，而张居正早就知道缘由，两人见面时他还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等大臣们跪下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立刻知道大事不妙，因为他是首辅大臣，按理应由他带领群臣接旨。

果然，圣旨说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他想干什么？太后、皇帝母子三人很惊惧。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

听完圣旨的高拱从开始的九霄之上，跌到冰海之底，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扶着他的胳膊，才让他站立起来。

两个宰相的PK，至此，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

第5节：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当着众臣，万历帝和两宫太后驱逐了首辅高拱。高拱当然知道自己被逐，是冯保和张居正在背后搞的鬼，对二人衔恨入骨。但得胜的张居正这一方，为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第二天，他联名对两人PK时作壁上观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上疏恳请皇上收回成命，让高拱继续留在内阁。奏折读起来十分感人，他说高拱身历三朝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他还说高拱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等五条建议，是自己和高拱联名上书的，事先又和自己商量过。如此由此皇上怪罪高拱，那么臣的罪过也无可逃脱。如果皇帝以为建议明确内阁、宦官之间的责权是大罪过，那么臣请求和高拱一起罢斥。

因为按明朝的祖宗规矩，上疏和皇帝的批示，就如红头文件一样，必须发给各级官僚学习。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张居正是何等光明磊落的男人。对于张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摆pose简直就是必修的武功。这种pose摆出来后，对失败的一方高拱来说，觉得更是一种侮辱。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自然皇帝不会照准，而且批示，众卿不可党护高拱。《明史。高拱传》对此只作寥寥数字的交代："居正乃与（高）仪请留拱，弗许。"真是春秋笔法。

张居正还对来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我为先生申请了驰驿。所谓驰驿，又叫乘传，就是沿途由兵部管理的驿站，免费提供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是一项特权，控制得非常严。到了后期就冒滥了，很多本来没资格享受这项特权的人，也想办法从兵部那里搞来驰驿的文书，大揩官家之油。，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形容："山人术士皆得乘传"，"驿使交驰"，"过客百倍于昔"，"夫马仆从动以百数"。驿卒、挑夫不堪其苦，明朝陆粲有一首《担夫谣》说到偏僻的贵州，乘传者都多不胜数，"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

如海瑞在当淳安县县令时，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儿子，也享受老子的特权驰驿，而且因为一个驿站的工作人员招待不好，把人家绑起来殴打。海瑞知道后，将胡公子逮起来，交给上司胡宗宪，说有人冒充大人的公子招摇，被我抓了。大人严以律己，不可能有这样的混账儿子。

我估计面对张居正的惺惺作态，高拱恨不得朝他吐一脸唾沫。但毕竟是读书人，老先生忍住了，但用挖苦的话回敬，俺回家就回家，要驿驰干啥？先生如此关照老夫，不怕皇帝再责怪你"党护"我么？搞得张居正脸红一阵，白一阵。高拱装孙子的功夫还是不到家，事以至此，不如也假惺惺地表示感谢。

这世上少雪中送炭之人，多落井下石之徒。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就不能一刻耽搁，那些锦衣卫前几天还对首辅毕恭毕敬，此刻三番五次催促、威逼、将他积攒的钱勒索得干净，而原来的仆人也大多携款逃逸，真正是树到猢狲散。高拱坐着骡车，带几名老仆，出宣武门，沿着大约今天的京珠高速公路的走向，往河南老家赶路。今天开汽车或坐火车，很快就到郑州了，可那时得风餐露宿好些天。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混杂在普通商旅中的高拱，很是狼狈。出京不远，刚到今天房山良乡时，一个差人手持公文赶上，说奉张居正的命令，来给高拱送驿驰的勘合。高拱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装好人，不受这道文书。旁边的亲朋劝他别硬扛了，这把年纪了。而且这享受特权的待遇，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而不受，那就是大罪。

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的高拱，最终还是接受了政敌的这番好意，一路接受公款招待，回到了老家。

第6节：且将剩勇打死虎

且将剩勇打死虎

在张居正、冯保的联手策划下，皇帝和太后驱逐了高拱，此时高拱已是62岁高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高拱没有在政坛上复出的可能，基本上是一个死老虎。

但对这个死老虎，冯保和张居正也不放过，尽管张居正表面上表现出大度和温情，向皇帝求情挽留高拱，为他申请到乘传的待遇。愤愤不平的高拱，远在河南老家，没想到自己被勾连到都城一件蹊跷的治安案件中，差点遭遇灭族的大祸。

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年幼的皇帝照例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廷去上朝。一位穿着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直奔过来，被警卫擒住，皇帝命令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保去侦查此案。

事关圣上人身安全，当然是超级大案，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快侦破。

首辅大臣张居正闻讯后，上疏皇帝，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平白无故混进宫内，肯定有极大的阴谋，背后一定有指使之人，务必追查出来。

由于东厂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保，其侦缉、预审都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特别便于屈打成招或诬陷他人。冯保和张居正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此案牵连高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冯保亲自审问这位自称叫"王大臣"的嫌疑犯，私下里密语王大臣，告诉他，只要说是高阁老（拱）指使的来刺杀皇帝，将给你官做，并命令自己的仆人辛儒，陪着往大臣吃饭喝酒，帮他捏造一套说陷害高拱的口供。然后在这个人两腋下面，分别绑刀、剑一把。如此，才开始审讯。王大臣按照冯保的吩咐，说自己受高拱的指使，并

供出高拱在京的家人李宝、高本等人是同谋，而且一搜查，嫌疑犯身上还藏有利刃。这样看来，能将此案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

"审讯结果"一传出，朝野议论纷纷，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件案子背后有政治报复的影子。吏部尚书杨博（字维约，山西蒲州人）和左都御史葛守礼（字与立，山东德平人），相约找到张居正，为高拱辩解，杨博说，这件案子关系重大，如果就这样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将人人自危。张居正对二人说，难道二位先生怀疑我要深文周纳，勾连高拱么？杨博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这样怀疑，但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而且更搞笑的是，急着撇清自己的张居正竟然很不谨慎，自摆乌龙。他拿出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杨、葛二人看，意思是此乃嫌疑犯的招供，与自己无关。可里面有四个字"历历有据"，葛守礼不愧是最高监察官员，一眼看出 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迹，张居正连忙解释，审讯的人不通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字。

主管刑部监察的邢科给事中，大多是些依法办事、不畏权势的正人君子，他们商量道，这样的案件审理和刑科相关，如果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案子就这样定了，我等以后还哪有脸见人！于是联合上了奏折，要求这件案子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联合审理。

案子一旦公开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冤案，难度就大多了。

张居正和冯保主意早定，硬要搞死高拱，不把此案交给刑部，但迫于舆论压力，命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再去会同冯保审理。朱希孝虽然是张居正的门客，但和高拱关系不错，他对王大臣用刑，要他从实招来，王大臣大叫，你们许诺我的富贵，让我说高阁老指使，凭什么又要拷打我？而且朱接受杨博的建议，将王大臣原来的招供的高府同谋的家人，叫过来混杂在人群中，王大臣竟然辨认不出。显然这是栽赃陷害，事情到这一地步，冯保怕反过来牵连自己，匆匆将王大臣用毒药弄哑，让他说不出话来，然后再草草宣布处决。

也有史家认为置高拱于死地，是冯保一人的主意，张居正并没有参加预谋。但作为首辅，如果他不默许，冯保一人也不敢有这样大的胆子。

冯保、张居正如此追打死老虎，固然阴毒，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万一高拱重新掌权，他们害怕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政治就是这样残酷。好在当时司法还不算很腐败，一大帮正人在朝，如果像后来魏忠贤那样，可以任意陷害东林党人，估计高拱难逃一劫。

第7节：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在内阁中驱逐了高拱，无人再能对自己掣肘，宫禁内有冯保的密切配合，两宫太后充分信任。皇帝的老师、首辅大臣张居正一人大权独揽，完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充分展示平生抱负。

当时的大明，已建国二百余年，矛盾百端，尤其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从经济、财政方面进行较大的改革，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我们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最有成效的两项措施是"清丈法"和"一条鞭法"。清丈是重新清量全国的田地，再确定应交的赋税，并查处许多隐匿的土地，如此不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则是将原来缴纳实物的赋税和出劳动力的徭役，统一折合成银两，简化了收税方式，稳定了国库收入，也做到了尽量不扰民，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如果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保障，再好的方案只能是画饼，很可能在实施中无疾而终。而当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暮气沉沉，推诿、扯皮、低效。

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僵化日久的政治制度，退而求其次，他选择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以考成法来督促各级各地官吏的勤政。

所谓考成法，类似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实施的绩效考核。传统的行政系统运转，主要靠公文的传递、落实来维系，但公文维系的行政系统，极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和文牍作风，上面的文件发下去了，下面也就简单地再往下转发，类似现在许多《关于转发〈XXX[关于转发xxx某某问题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类的具文。至于公文所提的要求，办理得怎样，是否完成任务，上面就很难控制了，有些朝廷来的公文，一耽搁就是好几年，形同一纸空文。

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这种弊端，上书皇帝提出公文办理的改革，皇帝当然照准。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清点。另外造两册帐簿，上面记录事情的概要和规定的期限。一册送主管监察的六科，随时掌握办理的进程，一册送到内阁备查。六科的监察官员将执行情况随时记入帐簿，半年再复查一次，对拖延的追究责任，向上参奏。如果地方巡抚、巡按拖延，由六部中分管的衙门举报；而六部有拖延欺骗蒙蔽的，由负责监督的六科给事中举报揭发；如果六科的监察官员自己拖延欺蔽，就由内阁来监督、检举。官员工作的评定，就以此为基础。

考成之结果，直接和乌纱帽挂钩，可想其威力。官场上，悠悠万事，官帽最重。如此一环扣一环，责任和权力明确，明朝那生锈的管理系统，似乎一下子就上了注入了润滑油，机器加速运转起来。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条办法，会发现一个奥妙，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自我扩权。各部督促地方，六科的监察官督促六部，而内阁督促六科监察官。也就是说，内阁把自己摆在官僚体系中最后裁决者的位置上，成为整个文官系统中最后负责人，而内阁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而明朝自主元璋因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后，百官理论上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内阁仅仅是皇帝私人的顾问班子，法理上没有统领六部等行政系统的权力。如此一改革，天下百官要向内阁负责，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宰相。

第8节：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张居正用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权力，自然要引起一些人的反弹，特别是主管监察的给事中、御史的监督、考核，也由内阁负责，这一下就惹怒了一些监察官员。他们不愿意受制于人。

明朝的监察制度完备而严密，监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给事中和监督地方的御史合称科道官，又叫言官，他们多是些七品的小官，但是能监督正二品的尚书，关键是科道官相对独立，比如兵部尚书够牛的吧？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根本不用拍尚书的马匹，也不用奉承内阁辅臣，因为他不由兵部尚书管理。再加上有"风闻言事"的免责权，就如今天西方一些国家的议会，议员如何说行政官员的过失，不一定要证据确凿，哪怕有失实之处也不能说议员是诽谤诬蔑。所以，小小的七品官，动不动就敢弹劾尚书、侍郎、内阁辅臣，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过失。

考成法一实施，言官们的监督、评价由内阁来行使，这一下我们想一想，给事中和御史这类监察官还能独立、自由地弹劾内阁以及六部尚书么？那么大多数监察官员当然要想方设法取悦于内阁辅臣。此法一实行，相对独立的监察权受到了内阁的侵蚀。一位大臣在《群臣阿附成风稽祖制以安社稷疏》中，批评考成法实施后造成的监察官员独立性的丧失："科道欲论一人，荐一士，则先送辅臣揭帖，名曰请教。"

言官们认为张居正此举是钳制言路，是对二百年来成熟的监察体制一种破坏，于是针对张居正的第一波批评浪潮袭来，发动者主要是科道官。

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是言官们弹劾大臣一贯的路数，此次对张居正也不例外。明朝迁都北京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鼎的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万历二年，南京的一个太监张进喝醉酒

了，殴打给事中王颐。这本来是一件小小的治安案件，但在正满肚子不平的科道官看来，一个阉人敢殴打堂堂的监察官，说明言官的地位下降，太监气焰的嚣张，而大力钳制言路的张居正，正好和大太监冯保亲如兄弟。物伤其类，户科给事中（监察朝廷财政部门）赵参鲁（字宗傅，浙江鄞县人）等人，便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要求严惩惹事的太监。北京、南京两都的言官纷纷跟进，好不热闹。张居正十分恼火，在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的最高监察官员）写信抱屈说，张进就是一个管膳食的太监，酒后放肆，送给内监执法者鞭笞，革掉他的馆管事权，也就行了。就算交付大家讨论如何处罚，也不能没完没了争个不停。到底为什么要议论纷纷？为什么要借一个太监酒醉而引起南北两都的台谏官员交相议论？

当然张居正知道言官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必须用铁腕制止这股针对他的风潮，醉酒的太监被处理后，上疏弹劾的赵参鲁因没事找事连降数级，贬至广东高安县当一个典史。--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朝廷对赵参鲁的处罚并没有吓住言官们，明朝的士大夫中，很有一些骨鲠之人。赵参鲁在上疏中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字行之，徽州婺源人）、河南道御史傅应祯（字公善，江西安福人）、巡按辽东的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上疏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让张居正伤心的是，傅、刘二人是隆庆五年张居正当考官取中的进士，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近乎父子，为此张居正很愤怒地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弹劾老师，这样的事情竟然让我碰倒了。

余懋学在奏折里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存敦大"，要对下面宽厚一些，考成法使官场之风变得十分冷酷，国家元气大伤；二是"亲謇谔"，即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三是"慎名器"，要赏罚分

明；四是"戒份更"，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五是"防谀佞"，内阁不要胡乱称赞司礼监太监。每一条都是针对张居正而来。

而刘台更干脆，指名道姓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便是《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言辞十分激烈，说，"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盟。二百年来，既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三四年矣。""阁臣例无印信，衔列翰林，翰林之职，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异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并进一步发挥，说巡按御史巡按各地，进行监察，不是特大的官员违法案件，一般不派出。因为挑选的人很精明强干，授予的权力较大，各地官员大多知道顾惜名义，不至于太狼狈不堪。即使是都察院对御史也是有统无属（用现在的话来说，最高监察部门对督察各地的御史是业务指导，并不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如此是为了不对御史控制太多。现在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集中于内阁，没有了独立性，负责监察的给事中、御史谁愿意冒着丢官甚至生命的危险，直言为政的过失呢？这番话和现代比较，依然有其价值。如果美国没有独立检察官制度，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点事，独立检察官能穷追不舍么？刘台的立论法宝是祖制，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设宰相的制度，为了显示自己是大公无私，他还特意强调："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第9节：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相当正确的手法。

刘台在上疏中所说巡按御史的权责，如果看过传统戏曲的人想必不陌生。许多戏曲中总有类似的情节，富小姐后花园和穷书生一见钟情，赠书生钱财上京赶考，书生高中黄榜，点了八府巡按，拿着尚方宝剑，替天子出巡，有先斩后奏之权，回来后和小姐完婚。《玉堂春》中的苏三，被洪洞县的商人买回老家做小妾，遭遇冤案，被判死刑，如果不是她在南京青楼时有过数夜情的王公子，中进士后作为御史巡按山西，她不可能苟全性命。

这样重要的监察权，现在要受到内阁的控制，搁谁也不愿意，御史们道理说得都挺好的，但不能不说有利益之争的成份在里面，屁股决定脑袋，身为言官，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话语权。

对言官们的密集炮火，张居正当然要反击，尤其是对背叛师门的学生，一定恨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和弹劾他的言官之间，处于实力极不平衡的状态。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得圣眷的宰相，而另一方是几个职位低、资历浅的言官，徒有一身胆气。双方交锋的胜负，估计这些上疏捋虎须的官员们事先知道自己的下场，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还是很值得钦佩。

张居正最管用也是那时候大臣最常用的反击办法，就是撂挑子，以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施加压力。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他的张老师呀，自然是安慰。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还是要辞职，并且以一种诚心诚意的语气对皇帝说，照理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不应该请辞，但受到了如此的非议，没法再在内阁待下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很伤心，皇帝亲自离开御座，扶起张居正，而且话说得很干脆，朕给你把刘台逮起来投进监狱。回到官邸的张居正虽然不说辞职了，但就是不出来办公，皇帝没办法，派太监带着礼物，上张

居正的家中慰问。皇帝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他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

皇帝下旨对刘台廷杖一百，充军远方。但张居正虽然恨透了刘台，就如他上疏挽留高拱一样，必须摆出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刘台不顾座师的情谊和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博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廷杖，张居正在舆论上将会更加失分，所以他上疏皇帝替刘台求情，免了刘台的廷杖和流配，仅仅削籍回家。

但张居正心中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整治刘台，而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往往是打击报复政敌最佳的方式，因为贪官谁都恨，因腐败被处罚没谁会同情。刘台巡按辽东时，和辽东的巡抚张学颜合不来，--明代的巡抚和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和巡抚不合是常态，因为谁都想说了算。而张巡抚此时已调到户部做官了，他知道张首辅痛恨刘台，便诬告刘台曾经私下里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刑罚，张居正如获至宝呀，派御史去辽东查核，同时派自己的亲信王宗载去刘台老家江西做巡抚，搜集他在老家不法之事。这些人都是张居正授意的，他们要拼命讨好张居正，周纳罗织，何愁没有"证据"？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之罪流配广西，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受到了牵连。刘台后来死在流放的地方，巧合的是，他恰好与张居正死在同一天，这一对冤家师生好像约好似的。张居正一死，便有人上疏替他抱不平，刘台的案件再复查，纯系冤案，当年诬陷他的官员被处分，他得以平反昭雪，赠官荫子，反正是中国传统平反游戏的老一套，没啥新鲜的。

除了控制朝廷言官外，张居正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最主要的做法是重申明太祖朱元璋的《卧碑文》，即天下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议论朝政，唯独不许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学生）谈论国事。因为他担心在朝廷对言路的钳制，会引起民间那些还没有出仕的知识分子反弹。并在万历七年，下令毁掉天下书院，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府龙城书院。后来举办东林书院的民间士人领袖顾宪成，还没有中举时曾

在龙城书院学习过，龙城书院是江南一代士子们相互切磋、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象征。张居正此举，实际上是和天下士人为敌，自然也引起顾宪成这类要求广开言路的知识分子反感和抵触，也使他死后被万历帝清算、改革人亡政息具有某种群众基础。

但张居正当权时，可不顾了这么多，他用独断专行的法家手段，短时间内成功地钳制了朝野的言路，使人不能对他的改革说三道四。

第10节：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处在不同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人，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这是社会的常态。而以监督、批评各级官员为职业的言官，他们对其他官员的为政提出不同意见，更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因为彼此有意见的差别，就能分出谁对谁错，谁进步谁守旧。

比如刘台等人对张居正改革的直言批评，其中也不乏迂腐的意见，今天看来，张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台等监察官员批评意见的价值，尽管批评者也可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想法。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不同意见之间很难得到平和的交流，而往往演变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激烈斗争，其代价是一方惨败而被淘汰出局，甚至其生命和健康都得不到保障，这是制度的悲哀。

刘台反对张居正，可以视为因政见不同，都是为了大明江山。而有一些言官的批评，却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沽直求名的嫌疑，放到传媒发达的今天，就是故意骂名人吸引眼球来炒作自己。

万历朝吏科给事中雒遵弹劾兵部尚书谭伦，就是典型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例子。万历登基之初，这人揣摩当时首辅大臣高拱的心思，上疏弹劾大太监冯保，说冯保在皇帝登基那天接受百官朝拜，而冯宝立于皇帝身边，等于搭了万岁爷的便车，他在疏中说"文武百官果敬皇上耶，抑拜冯保耶？"这种说臣子僭越的指责，在那个时代是很要命的。但当时冯保深得皇帝信任，这一弹劾没起到什么作用。

一年后，兵部尚书谭伦一个小小的失误，被雒遵抓住了，上升到相当的高度弹劾谭伦。

先交待一下谭伦这个人的基本情况，他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名臣。《明史》说他"沉毅知兵"，属于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一类的人物，文人带兵而建立功勋。从宋代以来，我国就有文官治军帅兵的传统。嘉靖中期，倭寇在东南横行，他正担任浙江台州知府，和戚继光一起练兵。"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既成精锐。"倭寇进攻台州及周边的县，谭伦亲自带兵迎击，三战三捷，将几乎所有入侵者擒斩，保住了浙江沿海的平安。后来升任福建巡抚，倭寇攻占了政和、寿宁两县，全闽震动。谭伦带领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将领先断倭寇退路，然后大破之，光复了一府二县，并请求朝廷蠲免受战火祸害地区的赋税。后又在北部边疆练兵，防备塞外胡骑。万历初升任兵部尚书，已是年迈体衰的老人了。

万历二年春分（公元1574年），皇帝派成国公朱希忠和谭伦，代表朝廷去日坛祭祀，对为人臣者，这当然是莫大的荣誉。不巧的是那几天老谭感冒了，祭祀时咳嗽不停，这个小辫子被雒尊等几位言官抓住了，上疏弹劾谭伦不胜任兵部尚书的职位，说"岂不能将祀事于一时者，能寄万乘于有事"，意思是他连一时的祭祀都搞不好，怎么能在国家有事时领兵呢？因为这点小毛病被攻击，谭伦上书辞职。明朝的官员特别爱以辞职来表白自己，今天受儒教文化影响很深的韩国，高官受到在野党议员或媒体的攻击，也动不动辞职。一些人认为这是议会政治所固有的现象，其实在东方国家里，文官一直就有此传统。

这谭伦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据说是内宠过多，这人在战场上比较卖力，在房中和妻妾在一起同样比较卖力。当然，对于这样一位颇有战功的官员来说，在那个时代也许连小节都算不上。据说他有壮阳的秘方，进献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但这种药方为一时快乐而损害整个身体，谭纶死去时年岁并不高，他在病榻上嘱咐过张居正：那样的药方最好不要用。可惜这种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张居正同样未能吸取。

皇帝烦这些言官的上纲上线，故意将他们一军，批复道，咳嗽这种小病容易治，而兵部尚书很难选到合适的，既然认为谭伦不胜任，你们这几个言官和吏部商量下，看谁更合适。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吏部，当然不会像这些言官那样信口开河，他们认认真真回皇上说，兵部尚书是很难选的，若因为谭伦咳嗽的小过失令他退休，不但不近人情，也有失国家礼制。万历帝于是借吏部这份意见，处分了几个言官，让他们各降三级，而对谭伦，仅仅是批评他失仪，罚了一个月的薪水，继续留任，直到万历五年死于任上。尚书全年的俸禄才152两银子，官当到这个级别，哪怕再清廉，也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非小妾）基本不用"，区区一个月工资，可忽略不计。

第11节：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围绕考成法等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地位更加稳固了。到了万历五年（1577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后，吕调阳、张四维等新入内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挑选的，犹如他的小跟班，对首辅张先生的主张，惟有点头附和的份，没有了掣肘的张居正，正雷厉风行地推进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就在这关键时刻，这年九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荆州府江陵县传来，他的父亲去世了。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如果不因为他生了个位极人臣、青史留名的儿子，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乡下老头，名字必定会湮没在无情的历史长河中。他二十岁那年，补了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可连考了七次，整整二十一年，连半个举人都没摸着。这和约300年后湖广大地另一个中兴名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命运相似，曾国藩老爸终其一生也是个乡村老秀才，最后都是父以子荣。

直到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以后，张文明才彻底断了科考的梦。如果他继续考，即使幸运地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他儿子将成为他的"前辈"，因此他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发达了，自己可以得到封赠。那时候，一个人做了大官，光宗耀祖可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是朝廷实实在在的礼制规定，朝廷给他的祖父、父亲送一个名义上的官衔。《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背景正和张居正当政时吻合，第十七回有一个叫浦墨卿的名士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官，他还要科举，点名时，监考的不敢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封赠只是名誉上，到底没有实实在在当官管事过瘾。

不得志的张文明幸有一个好儿子，张居正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去武昌考举人，本来很有中举的希望，当时湖广巡抚顾璘说，这孩子是将相大才，十三岁就中举，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得到一番磨练。而且特意留他吃饭，并解下自己的犀牛角装饰的腰带，送给张居正，并说，"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束君的腰（一品官用用腰带，二品官用犀）。"

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将青年才俊压一段时间的例子，当时不少。后来因触犯张居正被打屁股的吴中行，是常州武进人，父亲和哥哥都是进士。年青时他成为应天乡试中头名举人解元，参加应天乡试多是南京周围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等文风鼎盛地区的秀才，第一名的含金量远非别省可比。他的父亲吴性怕儿子得志太早，容易躁进，让他不参加来年会试，凉一凉过了四年再进京赶考。东林士人的领袖顾宪成十八岁中秀才，考了三届二十七岁时成为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他以前落第时他父亲面有喜色，成了第一名父亲反而有愁色，父亲解释说，以前你落第必定知耻而发奋，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子名冠东南士林，大家对你马上态度不一样，我能不忧虑么？对比现在"出名要趁早"，家长和媒体一起吹捧神童的浮躁，令人感慨。

张文明死时七十四岁，在那时也算是高寿了，看到儿子成为首辅，应当了无遗憾。可在这关键时刻去世，给张居正乃至大明的政局带来了危机。现在有人父母去世，儿女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会作为先进事迹宣传的。可那时正相反，父母、祖父母死，官员必须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如果隐匿不报不回家丁忧的，一律削职为民。

可在那个改革成败系于张居正一身的人治社会里，张居正离开相位近三年，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第12节：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因为儿子位极人臣，湖北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度大明帝国最大的公共事件。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子，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必须面对，谁叫他是全国除皇帝外最大的公众人物。

张居正嘉靖三十七年回南方出差，顺路省亲，当时他还是个正七品的翰林编修，从此和他爸一别十九年，再也没见面。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张居正和父亲情感淡薄，我觉得是有点想当然。人伦之情，人皆有之，他未必不愿意回家守墓庐三年，尽孝子之道。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有情，但他们经过一番利益考量能战胜个人情感。

无论从张居正个人抱负的实现，还是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此时暂别政坛是很不合适的，改革有可能会因此半途而废。但不回家丁忧守制，在以德治国的明朝，违背了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个罪过张居正甚至皇帝都担当不起。

如何规避这个棘手的道德问题也算是法律问题，是摆在张居正面前最难过的一关。只有一个办法，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不让他回去守制，理由是非常时期国家需要。这叫"夺情"，君王为了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

万历帝尚是一个少年，他也离不开自己的张老师。而大太监冯保当然也不愿意他在内阁中最重要的搭档离开，如果张一走，来一个和他合作不协调的首辅，比如高拱那样的人那将怎么办，他在宫内极力促进皇帝"夺情"。而内阁中惟张居正马首自瞻的几个辅臣，洞若观火，看透了皇帝和张居正的心思，既使他们心中可能在想，老张走了，我们的位置就会往前再进一步，但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迎

合皇帝和首辅，联名上疏，说内阁离不开张先生的主持，请皇帝下旨夺情。

尽管张居正此时不想离开相位，但向皇帝上疏请求解职回家丁忧的程序一定要走，这也是一种pose，中国传统文化中，摆pose是一门常用而高深的学问。皇帝明确提出"夺情"，张居正再哀求回家，皇帝再强调要夺情。--如此几个回合，君臣两人演出了一场逼真的戏。最后张居正接受皇帝的"夺情"安排，且想出了一番折衷的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营葬之事，并守制。--孙子为祖父母守制也是法有明文的。而张居正"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文薪水，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也就是说明自己并没有贪恋权位不守制，而是以守制之身替公家办事。--这确实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皇帝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办法，而且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如此一番演戏，皇帝和张居正以为找到了万全之策，可以巧妙地规避守制这一铁律了。但他们低估了朝野对这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大家都在盯张居正，不但是因为职位，更由于他的新政太惹人注目了，他能否回家守制已经不是他个人，也不仅仅是他和皇帝两人的事。

"夺情"的旨意一下，就立刻激起了一些官员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

经过考成法的实施，爱挑毛病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御史这类言官已被内阁控制，他们不发一声。可按倒葫芦起了瓢，冒出两位翰林词臣和两位刑部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他们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字子道，南直隶武进人）、检讨赵用贤（字汝师，南直隶常熟

人）、刑部员外郎艾穆（字和父，湖广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纯父，浙江嘉兴人）。这四人中，吴中行、赵用贤是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稳稳当当不惹事，外放做知府，或者进部院任要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第13节：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

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无限泛滥，直至否定新政。所以张居正必需用霹雳手段阻止这潜流。张居正曾对人说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说再高贵的花，挡在大路中间，也得把其锄掉。

张居正便用廷杖--打板子的方法来"锄"这些芝兰，来应对他一生最大的公关危机。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这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

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道："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正德朝的王阳明说得很明白："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归一。"

廷杖通常由司礼监太监监督，行刑人和监督太监心有默契，看监督者站立姿势决定下手的轻重。若监督太监靴尖朝外成八字型，就下手较轻，高高扬起，轻轻地拍一拍；若朝内成八字型，则下手较重，往死里打。

这番首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要往死里打。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字体健，陕西同州人）、翰林院的长官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两大重量级人物前来求情都没有用，连张居正儿子张嗣修的同年好友沈懋学（字君典，宁国府宣城人）拜托嗣修向父亲求情，也被拒绝。这沈懋学和张家的关系不一般，张嗣修中进士前，张居正物色天下的才子陪自己儿子读书，相互促进。沈欣然答应，后来中了状元，另一位大才子、《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字若士，江西临川人）拒绝了，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考取进士。

吴、赵两人被打六十棍后，发回原籍为民。打完后，吴中行口鼻流血，奄奄一息。中书舍人秦柱（字汝立，常州府无锡人）很仗义，带着医官赶来治理才救了一命。这要担很大的风险，亲朋好友前来探视受伤的吴中行，看管的士兵都要询问记录，朝廷要了解哪些人在同情他。赵用贤是个大胖子，廷杖时，一片片手掌大的肉脱落，他老婆

干脆将脱落的肉腌制起来收藏，留给子孙做传家宝。现在想来这种方式真有些恐怖。

艾穆、沈思孝骂张居正更厉害，因此他俩的刑罚更重。两人被杖八十，三天后才苏醒，然后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第14节：一个愤青的成熟(1)

被杖的四人一下子成为天下士大夫仰慕的楷模，当时皇帝经筵的讲官许国（字维桢，徽州歙县人）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刻诗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送给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刻诗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对二人做出高度的评价和美好的祝福。可世事难料，张居正死后，吴、赵二人重新回朝廷做官，许国已做到内阁中仅次于首辅的二把手，和吴、赵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许国谴责二人，"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今天看来，张居正这种危机处理方式霸道残酷，但在当时他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么？不像一个民主社会里，可以到议会替自己辩护，又没有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当时只可能一方不惜自己的生命博取舆论，另一方利用国家权利进行惩罚。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既不是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也不是个纯粹的法理问题，而是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的政治问题，对万历帝和张居正而言，不快刀斩乱麻将搅得没完没了。

一个愤青的成熟

在"江陵夺情"（古代避牛人名讳，以籍贯代称某人，张居正是江陵人）这一超级公共事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被廷杖。这个人简直就是飞蛾扑火，偏要去得罪一下当朝相爷和皇帝。他叫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

这人打小就是个神童，《明史》说他"九岁通《五经》"。且没有成为年幼聪颖、长大平庸的人物，考试的道路上一路绿灯，万历五年，二十二岁的他高中进士，在"五十少进士"的科甲时代，这个岁数年轻得让人嫉妒，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年，朝臣们围绕张居正父丧后是否要回家守制争论不休，而邹刚刚"释褐"。一般会试在春天举行，叫"春闱"，而张居正的父亲是当年秋天死的。此时的邹元标"观政刑部"，也就是说还是个办事进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刚分配到国家机关的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

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官场新鲜人，按一般的想法，肯定是好好看热闹吧，国家大事还轮不上你置喙。可邹进士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小年青，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也不为过。

这位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写了一篇火药味非常浓的奏折弹劾张居正，指出"夺情"的乖谬。奏疏写好时，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碰到吴中行等被廷杖，--当着上朝众臣的面廷杖，就是要杀鸡给猴看。看到上疏弹劾首辅如此下场，一般人会知难而退，而邹元标更激起了斗志，等吴中行被廷杖完，他将奏疏取出，委托太监转递，害怕人家知道这是骂张居正的不敢往上送，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而且还给太监塞了银子。如此，奏折方得上达天听。

比起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年轻气盛的邹元标说话更无禁忌。他说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更有几句话是专门戳人心窝子的，他抓住皇帝让居正在官守制的敕谕中的一句话评论，皇帝说挽留张居正的理由是，"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邹元标反问道，幸亏张居正是老爸死了要丁忧，可以挽留，如果不幸他死在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终将不定么？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张居正的上疏中有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如果以奔父丧为平常之事而不屑为之，他不知一个人惟有遵守五伦之道，然后才叫着人。现今有这样的人，父亲在时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不回家奔丧，还对世人说自己是非常之人，世人不是以为他丧心病狂，就是会以为这人是猪一样的禽兽，这难道就是非常之人？

不管谁有理谁没理，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似于人身攻击了。皇帝和张居正看到这样的上疏，震怒可想而知，远甚于对前四位上疏者的恨，照例是廷杖、远戍，而且打得比吴中行那四个人更狠。

第15节：一个愤青的成熟(2)

一个在朝廷没多少人脉关系的见习生被下旨廷杖，更没人敢上疏求情，惩罚他的圣旨写得和今天的白话文一样通俗易懂："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

我认为这是皇帝和张居正有意给邹元标找了个台阶下，也可能因为觉得自己理亏，没有下杀手。但活罪难饶，这个不懂事的见习生，比前几个人受伤最重。后来有人记载邹元标被杖的细节，可以窥见同样的廷杖，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廷杖时，把邹元标的两股分开，左脚垫在右大腿下面，因此受伤面积比两条大腿紧靠在一起大得多。廷杖完毕，奄奄一息的邹元标抬出来后，有人剥一张黑羊皮，包着药，裹在他的屁股上，如此肉才得以再生。--毕竟年轻，生命力强。从此，邹元标落下残疾，天阴时必定腿痛，走路也不利索了。

因为明朝官员经常被廷杖，于是就摸索出这样一种急救廷杖的方法：受了重伤，狱吏急忙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上面留有痕迹，称为"羊毛皮"。据高阳先生考证，因此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 彼时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但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如果是个"羊毛皮"，就不敢随便打板子，这样的人有一天可能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会施报复。因此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邹元标被远戍贵州都云卫--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够偏僻的。这样一个人，对张居正的仇恨想必应当是不共戴天吧。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作为当年反张英雄之一的邹元标，当然被重新叙用。不久他又惹怒皇帝，皇帝让他回家呆着，一呆就是三十年，此间他聚徒讲学，名满天下，被时人看成东林人士的领袖之一。万历死后，只做过一个月皇帝的泰昌帝又跟着死了，木匠皇帝天启登基，他被召回，官做到左都御史--最高的监察官员。此时，当年的愤青邹

元标，面对东林人士和其他派别，争夺道德制高点，相互攻讦，他首倡"和衷"，他说，如今当政的人不选贤与能，而是赶走贤能之人，而议论的官员又不能平心静气，而是各立门户。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朝臣和衷共济。他在上疏中说，"向之论人论世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

因此有人觉得奇怪，说他刚当官时那样爱憎分明，不威权势，为什么老了后要和稀泥？认为他已没有年轻时的气节了。邹元标笑道，大臣和言官不一样。风裁卓绝，是言官的本分。而做大臣如果不是大利害大是非的原则性问题，就要想方设法护持国体不动摇，怎么能再像少年那样冲动急躁呢？

万历帝削夺了张居正的官爵、谥号，到了熹宗时，大明已千疮百孔，百病绕身，大家才感觉到张居正这个非常之人的难得。正是在邹元标的一再恳求下，皇帝才下旨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名义，剥夺的官爵谥号又归还给张家。

因触怒张居正差点被打死的愤青邹元标，到了官居二品，年近古稀，就要走完漫漫人生路时，已经完全理解当年的张首辅了，这也许是一个愤青成熟的必然，可惜这份理解晚到了四十年。

第16节：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

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

邹元标等人因弹劾张居正被廷杖、流配，果然起到了威慑作用，满朝臣工不敢再敢犯龙颜了。但正常的渠道走不同，便有人选择了非正常渠道。那时没有网络，人们不能上网发帖子，但可以写大字报。《明通鉴》载："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揭榜于通衢。"

这揭榜就是匿名大字报，上疏则是实名制，实名有风险当然只能匿名了。但明朝有着超乎以前任何朝代的侦缉能力，东厂、锦衣卫的番子、细作遍布各地，这是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宝贵财富。皇帝诏谕："再及者杀无赦。"如此，连匿名大字报也消失了，看起来真的风平浪静，张居正可以一门心思扑在国事上。

第一件大事就是皇帝的大婚，十六岁的皇帝行冠礼后就意味着成人了，该成婚了。婚礼完全按照《礼记》办理，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最后迎亲，这些程序都得走一遍，皇家的婚事当然更加郑重。至今日本皇室娶皇妃嫁公主还仿照着这样的古礼，中国一些农村操办婚事，要合八字，送彩礼，选日子，实则是古礼的遗迹。

纳采问名是向女方求婚的意思，皇帝为至尊，当然不能托普通的媒人去干这事，一定是亲贵大臣，皇帝下旨让英国公张溶为正使、张居正为副使去持节行纳采问名，正使是勋臣的后代，他们的祖先一般是随朱元璋开国或随朱棣"靖难"的大功臣，爵位世袭，地位非寻常文臣能比，张居正以首辅充当副使，可见太后和皇帝对他的器重。要知道，他正"在官守制"，只能穿便衣，为父亲服丧。这事在礼法至上的明朝当然又非同寻常，因为皇帝的婚礼是天下第一大喜事，怎么能让一个正服丧的大臣来当副使呢？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提出异议，认为皇帝夺情挽留张居正，是因为军国大事离不开他，而皇帝大婚与经国筹边不一样，因此乞求派别的 大臣充任。

皇帝主意早定，没把这样的奏疏当回事，张居正也顺水推舟，说"凡可以虑忠效劳者，皆不避神迹，不拘常理"，脱下服丧的衣服，换上大红官袍去办这桩天下第一大喜事。皇帝和太后让张居正当大婚副使，这是种象征性的任务，无非充分体现皇帝对首辅的信任和仰仗，礼法治国更多的就是靠象征性的礼仪支撑，言官看不到这点，简单地和军国大事对比，显然不得为政之精髓。

皇帝的大婚办完了，张居正得回老家办父亲的丧事。尽管他被"夺情"，不能回家丁忧三年，但老爸的葬礼，他还得参加。征得皇帝的准许，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离京回湖北江陵葬父。上一次回家，是十八年前，自己还是个七品翰林编修。在上次省亲之前，他曾在家休了三年的长假--当年父亲健在自己体壮，自己尚可一歇三年，那是因为在政坛上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真正到了需要为父亲守制三年时，却担当了国家重任，不能抽身。这大约就是人生的无奈吧。他当年休完三年长假重入官场时，写下一首明志的诗："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他用的是豫让以死报知遇之恩，韩信千金报一饭之恩的典故。可那时前途茫茫，能否报"君恩"他自己都不知道。近二十年过去了，他有了报君恩的机会，也真的做到了"岂恤人言"，不怕别人的议论。

归家葬父，对张居正来说，是一次富贵还乡。

荆楚大地，在明朝开国时很不受待见，因为这块地方是朱元璋打江山时最大的劲敌陈友谅的根据地。而明朝中叶正德皇帝驾崩后，大明的风水转到这块土地上了。正德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他的堂弟16岁朱厚熜从父亲的封地湖北安陆，入京承继大统，国脉得以延续。这地方出了个真命天子，是为嘉靖，现在嘉靖的孙子万历在位，这块土地又出了个才干几乎超过二百年来任何一个文臣的首辅张先生。

张居正回家葬父，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动静搞得相当的大。

尽管首相请假回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内阁现在只剩下了吕调阳和张四维两人，而一个大帝国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据《明史》记载，张居正本来想请退休回家的老首辅徐阶重新出山，可想到徐阶是自己的老师，自己回朝廷后，还将继续让老师坐首相的位置，内阁是按资历排位的，徐阶既是张居正的老师，以前当过首辅，不可能居学生之下。张居正总不能让皇帝明文谕示徐阶仅仅替自己替几个月班，再等他丧事办完就立刻回宋江老家吧。于是他建议让马自强（字体乾，陕西同州人）和申时行（字汝默，苏州长洲人）入阁。这马自强曾和张居正在政见上多有抵牾，但这回张居正不计前嫌推荐他入阁，他心存感激，从此十分佩服张居正。此番安排可看出张居正的用人之术。

张居正离京时，皇帝和太后一再叮嘱，让先生早点回来，国事离不开先生。并赐"帝锡忠良"银印一颗，及银两、绸缎等其他赏物，派司礼监太监到京郊为张居正饯行。如此皇恩浩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连皇帝都如此敬重首相，那不用说，一路的官员拍张居正的马屁唯恐不及。所过之处，沿途的地方首长率群官长跪行礼，巡抚、巡按越过自己的辖界迎接，为张居正做前驱。回京路经襄阳和南阳，襄王和唐王出来迎候，为他设宴接风。按明朝礼制，亲王是天潢贵胄，人家的爵位摆在那里，大臣不管权力多大，见面也得向亲王行臣子之礼。可张居正只行宾主之礼，拱拱手敷衍一下，这确实有僭越之嫌疑。

第17节：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1)

俗话道："太太死，压断街；老爷死，没人抬。"说的是人情之世故，老爷还在位时，太太死了来送葬的人多得压断街，等老爷自己死了，不用再巴结他了，送葬的人就少得可怜。所有的葬礼其实和死者没关系，都是给活人看的。现在当朝首相张居正葬父，那家乡的地方官能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表示一下么？张居正当国后，民间流传"官楚则贵"的说法，说的是在张居正家乡当官，只要和张府的人搞好关系，升迁就非常容易。

皇帝派来参加葬礼的特使有司礼监太监魏朝--这人很有权势，后来魏忠贤拜在他门下，然后反噬，把魏朝的马子熹宗的乳母客氏撬过去再害死他。还有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浩。护送张居正的有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深荷张居正知遇之恩的名将戚继光派一队卫士，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鸟铳随行。行省、道、府、县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叫风光大葬，这就是风光大葬。当然也有不拍马的官员，巡按御史赵应元和荆州推官（分管当地司法）魏允贞就不去参加葬礼，张居正不高兴，赵后来因此被张居正的门客都御史王篆弹劾。魏允贞这人耿直清介，官声很好。生了一个太过于聪明的儿子，后来投靠魏忠贤做了内阁辅臣，是魏忠贤残害忠良最重要的帮凶，这算典型的好爸爸教出坏儿子。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

敢于任事、通达识变的张居正没有海瑞那样的道德洁癖，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官场时就明了在心，且随着阅历的增加，运用得越来越纯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执，总认为自己开出的济世药方是最管用的，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为清廉，专断固执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并显出几分可爱。而

张居正柄权后，专横跋扈和贪腐互为催化剂，便成为让人诟病之处，也成为身后被万历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理由。

脾气随着官爵见涨，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五百年来如王阳明、曾国藩这类大儒身居高位后，还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几人？隆庆帝在位时，内阁中先有徐阶，后有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饰，等徐阶退休，高拱被逐后，小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又有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协作以及太后的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那么他没办法不专横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没办法不贪污腐化。不仅张居正在这种权位上很难抵抗，我估计即使换上王阳明和曾国藩也够呛，因为王、曾从来就没有掌握张居正这样大的权力。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只是一个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边的近臣高高在上，阳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谨慎奉迎；而曾国藩头上一直就有着慈禧太后为首的满蒙集团给套上的紧箍咒。

《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其性格自经历父丧后愈加恣肆专横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对包括门生、同乡在内弹劾声浪的一种反弹，越攻击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现；其二是在考成法实施、夺情等风浪中，他用霹雳手段打击惩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取得了全面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没人在敢给张相爷提反对意见了，满耳听到的只有赞扬、奉承之声。比如说，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黄金锻造的对联给张居正，上下联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岳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得太过分了，把张居正和天子并列，简直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烤。张居正的同年进士、大文豪王世贞对这位年兄颇有微词，说张居正"一事小不合，诘责随下，敕令其长加考察。以故御史、给事中虽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内阁中如吕调阳、张四维等大学士，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在首辅的后面亦步亦趋，几乎成了张居正的小伙计。

有一件事能说明张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说过，张居正回家葬父，湖广巡按赵应元说自己差使已经办完，正在和新任者办接交手续，且身体有病，因而没参加，张很不高兴。出自他门下的佥都御史王篆，怂恿都御史陈（"火" "介"）弹劾赵应元故意借病规避，赵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户部员外郎（约副司长的级别）为找应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陈（"火" "介"），说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诸臣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为什么陈都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劾赵应元？你陈都御史在嘉靖朝养病十余年，现在攀附权贵骤然任重要官职，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用来指责别人，何以服天下？

第18节：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2)

王国汲最有杀伤力的一段话是，"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威权比皇帝还大。居正大怒，想让王国汲下狱廷杖。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建议从轻发落，仅仅对王国汲削职，皇帝同意了，居正迁怒张四维，好些日子不给张四维好脸色看。张居正死后，许多人怀疑四维参与报复张家，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一个有权者是否清廉，不仅要看本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看他能否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张居正祖上是跟着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从凤阳起事的底层军官，定居江陵后，一直没出什么大官，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这一代，也就是个亦耕亦读的小康之家。万历四年刘台上疏说张居正，"辅政未几，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那个时代，官做到这个份上，财富是挡也挡不住的。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个人操守尚可，年少时家贫，做到首辅后，两个儿子在松江老家横行霸道，大肆敛财，致良田万顷，成为江南最大的地主，罢相后碰上海瑞这个不讲情面的硬汉巡抚应天，生生让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阶管不住自己的儿子，而张居正当首相后，老父尚在，那父亲就更难管了。加上湖广的地方官想方设法巴结张府，张老太爷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这下能不飘飘然么？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万历元年，当地衙门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第，让武装警察--锦衣卫上工地当工人，这在明朝是超级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时代，不管功劳多大的官员，用锦衣卫做私事，被他知道后必定严加惩处。张居正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为此自责一番："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长江中间的泥沙淤积成为可耕的沙洲，当地官员慷慨地把这块国家的土地送给张居正。张居正的贴身仆人游七也掏钱买官，和士大夫

称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对此当然十分厌恶。不过想想《红楼梦》中走下坡路的贾府都能保举世仆赖尚荣为县令，何况权倾天下的张相爷。但满清入关后，贵族家包衣奴才保举为官是常态，而明朝士仆的阶层分野更为明显。

官员们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张居正的官邸，张居正也许会拒绝，于是官员就直接送礼上江陵张府，家里的人更挡不住这轮番的糖衣炮弹。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提到，给张家送礼最积极的是两广的官员，大概岭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没有中原那么多礼仪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道，"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说，到了他这个位置，不用去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他给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讲到一位知县给他送礼，"屡却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为相爷嫌少，最后给他送上一条玉带。--他十三岁时湖广巡抚顾璘就慧眼识才，说他日后有用玉带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级别，别人主动送玉带上门。张居正大为惊异地说，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

至于被后人多有提及、认为是张居正品行上污点的是他的私生活问题，而我觉得，比起亲属受贿、重用亲信等问题来说，个人生活问题是危害最小的。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腐败，伤害的是公共利益，后者是私德问题。王世贞说张居正因为内宠太多，而年岁渐高，于是常服春药，这种药阳而燥，则饮寒剂排泄，冰火交加，郁结于下引起痔疮，又引起脾胃不能进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脑部，阳亢之药性引起头部发热，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据说严冬时张相爷不戴帽子，官员入内阁见张居正时，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

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张居正毕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强大到无处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御呀！

第19节："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和私德不修、广受贿赂相比，破坏一种公平的制度是更大的腐败。在现代国家，宪政体制下最基本、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是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而在明朝，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起码的公平是科举。无论是勋戚子弟，还是寒门秀士，在科考面前基本上是机会均等，如果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受到了损害，政府的信用可能将受到最大的质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和各省的督抚以及边塞将帅私通信件，在京城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收受贿赂多是他家乡的父亲、兄弟以及仆人干的。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们，张居正不希望他们没出息到收点银子，买些田地，而是希望他们和父亲一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此，给儿子谋取最大的私利就是科举舞弊，让儿子们顺利进入宦途。科举的腐败是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

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在他当政时中进士，而且嗣修为榜眼，懋修为状元。有一个马屁精送给张府一副对联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说的就是张家的盛况，张居正欣然将其挂在家中。

万历二年，长子敬修参加会试落第，张居正很生气，那年的进士便不馆选，所谓馆选是不定期从进士中间选庶吉士进翰林院培训。庶吉士称为"储相"，那一届的进士受了池鱼之殃，丧失了做"储相"的机会。三年后他的仲子嗣修高中榜眼，再过三年到万历八年，六年前落第的敬修和三弟懋修一起参加会试，都成为进士，而且老三是状元。

尽管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都天资不错，但在父亲当权时，如此高密度地中进士，且名次靠前，天下士子当然会忿忿不平。理论上说，不管父亲官多大，儿子也有和其他士子一样参

加科举的机会，否则就是对其不公平了。但在那种贪腐的文化和专制的制度下，只要参与竞争，就很可能对别的士子不公平。因为一个人官做到足够的份上，贪腐、谋私都不需要自己费脑子，自有人替他操办，所以有时不得已而矫枉过正。居正殁后，太仓王锡爵为相时，儿子乡试中了头名解元，被天下人责难，王锡爵为了避嫌，干脆不许儿子参加会试。直到王锡爵退休多年后，这个儿子才高中榜眼。

对这种最大的腐败，唯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可以阻止，但皇帝不但不阻止，反而纵容、鼓励。万历五年张嗣修会试中式后，照程序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所以进士称天子门生，但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真正主其事的是读卷大臣，内阁首辅当然要参加读卷，张居正要求回避，万历帝说，"读卷重要，卿为元辅，秉公进贤，不必回避"，就是举贤不避亲的意思，而且说了句大实话："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居正官做到了顶点，家里也不缺钱财和田地，皇帝能酬劳他的，只有牺牲公平，拿国家的名器送人情。

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利用权势为儿子在科举场上谋私利成为重要攻击点，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三个儿子"滥登科第"，皇帝看完奏疏，下旨将张的几个儿子的官职、科名革除。--反正皇帝什么时候都有理，科场腐败在以前是一种酬劳元勋的礼物，几年后成了惩罚张家的理由。

第20节：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

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

张居正越来越老了，加上国务缠身和内宠过多，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他辅佐的万历帝，一天天长大进入青年时期。

此时，张居正的权力和威望正处于鼎盛时期，尽管他对下僚越来越专横，但作为一个识穷天下、读通经史而又在宦海浮沉三十余年的首相，站在人生的顶峰，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危机感。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功高震主，这类典故历史上不知有凡几，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和家族的未来。

万历六年他回家葬父时，皇帝担心他在家盘桓过久，一天之内下了三道诏书让他尽快回京，--如此急迫真如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令岳飞回京一样，只是张居正回来是辅政，岳飞回来是等死。如此旷代恩荣，张的门生、湖广巡按朱琏要在江陵建一个"三诏亭"以示纪念，张居正去信阻止，他很明白地对这位官员说，建三诏亭，情意甚厚，但是他日情势一变非同今天，高台倾覆，曲池填平，我的宅第也许都不存在了，这个亭子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普通的接官亭，到那时谁能说见过所谓的一日三诏之事呢?

万历八年，皇帝已经虚岁十八了。张居正想到激流勇退，他上疏请求退休，恳切地说："每自思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后解释自己以前因为时机未到，不敢突然乞休，现在中外安宁，皇帝已经大婚，也行了耕藉和谒陵大礼，圣志已定，圣德已新，朝廷忠贤济济，意思是皇帝完全可以自己亲自处理政事了。但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内心自信而骄傲，尽管他明白功成身退的大道理，但言语中不由得流露出自己的个性，这种细节把握是最难的，他在这道奏折里说："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注意，张居正说的是"归政"而不是普通的"乞休"，他在万历初年厉行新政时，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核名实"，中国人讲究名实相

符，讲究正名，因此特别喜欢在字眼上做文章。所谓归政就是把执政的权力还给皇帝，这就意味着他认为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普通地辅佐皇帝，而是代替皇上发号施令。万历年间的沈德符注意到这个细节，他说曾经有人当面奉承张居正的相业，张居正大咧咧地说，我非相，乃摄也。"相"是宰相辅佐帝王，"摄"就是行摄政之实。沈德符就此评论，千古至今，明确据摄政之位的只有周公姬旦和王莽，难道今天能有第三个？沈氏认为张居正自言"归政"，俨然把万历帝当成周成王。而张居正因骑虎难下，终于不免霍光和宇文护的下场。（《万历野获编》）霍光在西汉时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昭帝死后他又辅佐汉宣帝，执政二十余载。霍光死后，霍家被汉宣帝找个理由惩治，几乎灭门。宇文护先任西魏大将军，后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柄朝政数年，结果被皇帝所杀，全家下场很惨。

万历帝五岁就开始读书，在文学和书法上修养极高，成年的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典故，心里能舒服么？我们知道姬旦以天子的叔父摄政，尚且不免"周公恐惧留言日"，而另一个摄政，"王莽谦逊未篡时"，到底是篡了女婿的帝位。明朝以后的清朝，也有过两位摄政王，一位是顺治的叔父多尔衮，多尔衮死后其家族的下场和张居正一样，还有一位是宣统皇帝的生父载沣。

尽管实质上张居正是"摄政"，但中国的许多事情，做得而说不得，他自己却说出来了！

张居正当权的时间太长了，皇帝还没有做好其"归政"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年轻的皇帝还没能"断乳"。第一次张居正请求退休时，皇帝明确拒绝。张居正接着再上第二道奏折，没有要求彻底淡出政坛，只希望暂时休息一下，内阁大权委以他人，"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而且表示如果国家有大事需要效劳，自己还没死的话，皇帝尽可驱使。

十八岁的万历帝血气方刚，未必不想亲政，一展身手，如果张居正继续坚持退休，照万历的个人意思，很有可能同意。最后否决张居

正退休要求的是万历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这位在山西民间长大的女人，比起长在深宫之内的儿子对世态国情了解得多，她被选为宫女，没想到有机缘承恩，生了包括万历帝在内的两个儿子，那个年代妇女要有地位主要靠肚皮争气，而在三千佳丽充下陈的皇宫，一个宫女给皇帝生了个儿子，真是上天的眷顾。她看得出要治理好这个庞大的帝国，年轻的儿子比起炉火纯青的张居正来说差远了，张居正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在明代的制度和文化约束下，不可能出现曹操那样的宰相，一个科甲出身的首辅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极小，再威权震主也威胁不了自己儿子的皇位。至于张居正要退以自保的想法，对一心只希望儿子江山稳固的太后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

从这点来说，太后爱自己的儿子是最大的自私，自私到根本不考虑别人的安危。她明确地告诉万历帝，"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张文忠公全集》）让皇帝而立之年才亲政，未免有点太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了，但知子莫如母，张居正死后万历帝执政进退失据，把朝廷搞得一团糟证明太后的判断是正确。但这样的明确指示，长大的皇帝听后能高兴么？他对母亲没办法，就有可能迁怒于过于能干的首辅，怨恨的因子就这样一点点积累下来了。

第21节：临终前的恩荣

太后这样说了，张居正没办法再坚持退休，拖着病躯继续打理国务。除了太后外，还有一批人不希望张居正这么早退休，这些人是他提拔、重用的官员们。在那个强人政治时代，张居正的进退决非个人的事情，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张居正退了，这些人就失去了政坛上的依靠。

早在张居正父亲死后，皇帝下诏夺情，张居正假装坚持回家丁忧。在自己备受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参劾时，另一位门生就是那位要建"三诏亭"的朱琏和一帮人挽留他，而且说："老师不听主上挽留，徇私负国，门生便入疏参老师矣。"（《万历野获编》）--这是更加高明的拍马屁，以国事的名义、诤谏的面目出现。回去守制尚且如此，这回要退休，更会有一帮利益相关者上疏挽留张居正。因此《万历野获编》评论道："庚辰年，江陵已病，其求归甚恳，主上亦为心动矣。时大婚已三年，慈圣亦久归政回宫，圣龄将弱冠，正太阿在握之时。使其得请。可谓君臣终始，两无负矣。而大小九卿则吏部尚书王国光等，太常卿明武卿等各公疏留之，言路则吏科都给事中秦耀等，山西道御史帅祥等亦合衙门保留，何也？逾年后病不起，身后旋受大僇，亦岂非诸公再误之，使上有骖乘之萌乎！"--"骖乘"即和皇上同乘一辆车，汉制，天子大驾出巡，大将军骖乘。比喻权位震主，霍光因骖乘罹祸。

这些拍马屁的官员，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和太后的心思一样，最后害了张居正。

临终前的恩荣

张居正终于支撑不住了，万历九年（1581年）七月，他病倒了，看起来只是身体虚弱，而非大病，但病毒已经严重侵蚀了他的肌体。不久病愈，照常入阁办事，十一月，他任一品官满十二年（京官六年一考察），皇帝对他大加赏赐，亲笔敕谕："卿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十

年，四海升平，外夷宾服。实赖卿匡弼之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兹历时二年考绩，特于常典外，赐银一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二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勿辞。"（《神宗实录》）一百两银子、二百石米和两件外套对富冠全楚的相府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出自钦赐，那是莫大的恩宠。

皇帝这样看重元勋，吏部当然要紧跟，便建议给张居正非常之赏，欣然同意，令给张居正支伯爵的俸禄，加上柱国，太傅，被张居正推辞掉。十年二月，病又发了，病灶在下体，痔疮痛得很厉害，但这非寻常的痔疮，乃是体内毒素无法排出的表症，割掉以后，身体更加虚弱。首相久病不起，正是考验各级官吏忠心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设高干病房的医院，官员们不能去医院送钱送物，--首相现在根本不缺钱。但可以采取更公开的方式表示对首相病情的关心，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部寺、科道、詹翰诸臣，纷纷于寺庙设斋醮，祈祷相爷早点康复。一些人抛掉政务，到处找人做法事，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心诚，暴晒在太阳底下，希望以此感动上苍。烧香祈祷的长篇祝福文章，用红纸或红锦抄录成副本，呈给张居正看，--这忠心不能白表，得让相爷知道呀。张居正深居家中养病，一般人见不着他，于是拍马者贿赂其家人，递进去希望张居正过目，夸赞一句或点头一笑，就会成为进献者夸耀于同僚的幸事。大家争相重金聘请枪手写这类祝福文章，估计那段时间京城内的马屁文章高手日子过得很爽。北京这样，紧接着南京和各省也开始效仿。

日后名满天下的东林人士领袖顾宪成此时刚中进士两年，还是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当时举朝凑钱在东岳庙祈祷，顾宪成没搭理这事，同事担心他因此得祸，好心代他在文后签名。他知道后，骑马到东岳庙，当着众人把自己的名字抹去。顾宪成此举固然表明他有操守，不谄媚。但大家都这样干，跟着留个名字又何妨，在官场上不和光同尘的人很难混，太过于爱惜羽毛也是个毛病，顾宪成日后的遭遇与此性格大有关系。

众官的祈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张居正的病一天天加重了，看来是回天无术。此时，皇帝给了他行将就木的老师最高的政治荣誉，进其为太师，加岁禄二百石，一个儿子升为世袭同知，快死的人这次没法推辞了。

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正一品，为明朝文官最高级别。宣德朝后，"三公"的官衔，文臣没有谁生前得到，"文臣得加三公，惟张居正"（《明史·职官志》），只是这种待遇对马上要上黄泉路的张居正本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第22节：大明的参天大树倒了

大明的参天大树倒了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张居正在死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以身殉职，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大明最后一棵参天大树倒了，从此，王朝出现危局时，再也没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才识出众，有魄力而敢担当的宰相能出来力挽狂澜。死后，皇帝表示痛悼，辍朝一日，谥号文忠，赠上柱国，差四品京卿、锦衣卫堂上官、司里监太监护送灵柩回湖北江陵老家。二十三岁时，心怀凌云之志的张居正从老家启程，进京参加会试，从此把一生给了这个已暮气沉沉的帝国。

尽管张居正擅权跋扈，以非常手段行使新政，遭来了许多阻力和朝野间的议论，但这个强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是成功的，无人能挡其锋芒，尽管他和他家人因为大权在握，而造成了贪腐，但他给大明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无论从国防、财政、民生和吏治，他力挽了正德朝后江河日下的颓势，营建了万历初期的繁华，《明史·万历纪》评价道："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国防方面。隆庆朝时，张举正鼎力支持北方边防最高长官宣大总督王崇古，对威胁明朝北疆最大的鞑靼俺答部，采取羁縻政策，封俺达为顺义王，开互市，换来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已基本解决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蓟州把守都城东北的门户，另一位名将李成梁出山海关，深入辽东取得数次大捷，东北基本平静，女真各部正在相互攻伐，努尔哈赤还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建州女真威胁十数年后才显露出来。

财政方面。经过清丈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新增耕地面积182万余顷，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税源也就增加了。万历五年帝国中央银库太仓库收银436万两，比11年前隆庆帝登基时201

万两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仆寺（总后勤部）当年的岁入银两也超过了400万两，京师仓库所存的粮食足够六年消费。

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民间经济十分活跃。张居正重用了潘季驯，于万历七年完成了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

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员懒散推诿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基本上实现了"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生前在给一位官员的书信中说到自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张文忠公全集》）这位不怕前有陷阱和万箭穿身的改革者，没有想到，他教出来的皇帝是那样对待他的子孙，也没想到自己创建的中兴之局只是昙花一现，一个甲子后就亡国了。

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

比起自己的叔爷爷正德皇帝，少年万历帝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他是在"三合一"式的严格管教下成长的。贤母慈圣太后、严师张居正、忠仆冯保将他包围，按照尧舜之君的标准培养小皇帝。

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对儿女过于严格，往往事与愿违，教育皇帝也是这个道理，而且比培养普通的未成年人更加困难，因为人家是万民所系的天子。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一个正在成长、不无叛逆性格的少年而言，贤母、严师和忠仆是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三座大山的合力下，万历帝没有办法，甚至是无意识地服从，显出他聪慧勤勉、少年老成的一面，但这种违反少年心理特点的教育方式，难免在万历帝心中暗暗种下仇恨的种子。

慈圣太后教子甚严，她好比一个有着万贯家私的女主人，丈夫死得早，孤儿寡母看管这份家业，最担心的是儿子变成一个败家子，何况这不是份普通的家业。万历登基后，她住在儿子的寝宫乾清宫，全天候24小时看管，再冷的冬天也让宫女把儿子从被窝里拉出来，督促

其学习。万历帝犯了错，动不动就让他下跪。--人家虽然年少，但毕竟是皇帝。等万历帝大婚后，老妈不能再日夜看管娶了媳妇的成年儿子了，慈圣太后搬回自己的寝宫。万历帝第一座大山从头上卸掉了，老妈更多的精力放在关心同胞弟弟潞王。

第23节：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

凡对儿子要求严格的母亲，一般比较重视请家庭教师，而且对老师很尊重。张居正当然是先帝和太后聘请的一个非常合格的家庭教师。过去农村严母教子，对先生特别信任，常说诸如此类的话：小孩子不好好读书，不听话，你帮我好好管教，打他都不要紧，这是为他好。慈圣太后当然不能授权张居正体罚做皇帝的儿子，但那思路和农妇差不多，鼓励他严格对待万历帝。甚至拿先生吓唬万历帝--"使张先生闻，奈何！"（《张文忠公全集》）和现在差不多，很多孩子畏惧老师甚于父母。皇帝大婚后，太后还叮嘱张居正，我不在皇帝身边，先生得更加用心教导。张居正也慨然以严师自居，不顾及自己学生的特殊身份，就像对待普通学生那样悉心教导、严格要求，只差没用戒尺打手板心了。一次教万历帝《论语》，万历将"色勃如也"的"勃"字念成"背"字，张居正大喝一声，要念"勃"！吓得皇帝大惊失色，在场侍读的其他官员也惊慌失措。我估计万历帝在睡觉时也觉得张先生一双威严的眼睛在盯着自己，真如芒刺在背。张家招祸，固然有居正生前威权震主的政治原因，但这类细节不容小觑。尽管皇帝理智上可能知道先生是为了大明江山，但情感上因为张居正的严厉而屈辱感日生，那种仇恨的情绪有机会就会释放出来，人是复杂的动物，大恩成仇，赤忠招怨是常有的事呀。现在张居正死了，第二座大山不存在了。

和张居正结成神圣同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没有了外援势力大减，皇帝推翻自己头上最后一座大山的时机成熟了。

第一家庭的成员，远不如庶民那样彼此亲密无间，尽享天伦之乐，儿子要见皇帝爸爸很不容易，嘉靖晚年，他和太子干脆多年不见面，说两龙碰头不吉利。皇帝的儿孙，很难享受到正常的父爱，如此，和他们朝夕相处、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保姆"太监，相当程度地充当了父亲的角色。也许因这个缘由，少年皇帝万历和天启，对他们成长时的贴身太监冯保、魏忠贤十分敬重。

这冯保，还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仆人，不仅对皇帝照料十分细致，尤其时刻提防他接受不健康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看管现在的孩子一样，不许他进网吧，不许他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尽量净化他的成长环境。万历御极之初，内阁大院的池塘里长出白莲花，翰林院飞来一双白燕，大家以为这是祥瑞，张居正准备将这祥物敬献皇上，冯保毫不客气地对这位老搭档说："主上冲年，不可以以异物启玩好。"（《明史·冯保传》）

因为太后和皇帝的信任，这冯保和张居正一样，气焰越来越旺，"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这是凡夫俗子很难克服的人性弱点。 对这样一个恪尽职守的奴仆，太后很仰仗，曾对冯保说"万分当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神宗实录》）神宗像对张居正一样敬畏冯保，可毕竟是热血少年，天性好玩闹，每当和小太监游戏，看到冯保进来，马上正襟危坐，说，"大伴来矣"。--"大伴"是皇帝对冯保的尊称。

摊上这样严厉的母亲和老师，再加上这样一个生活秘书，可以想象皇宫中长大的万历，应当阳光灿烂的少年时代过得是何等的压抑。对自己亲生母亲他没办法怨怒，可对老师和贴身生活秘书，那就不一样，渐渐地对这位大伴的态度，由敬畏到厌烦，再到怨恨。有一天皇帝在身边两个小太监孙海、客用的引诱下，喝醉了酒。酒壮怂人胆，对冯保的怒火一下就喷发出来了，他将冯保认作养子的小太监打伤，骑马到冯保住宅，门外仗剑大呼冯保的名字，吓得冯保抱住大石头顶住宅门。第二天冯保报告给慈圣太后，太后大怒说要告太庙，废黜万历帝，另立其弟弟潞王。这下皇帝知道闯大祸了，跪下向母亲痛哭流涕地求情，诱他喝酒的两位太监被罚到南京孝陵种菜，可他心中恨死了冯保。

张居正一死，万历帝着手剪除冯保。宫内太监也多是趋炎附势的，一看冯公公快失势了，急于争宠邀功的太监张鲸帮助策划--无论太监还是大臣，踩着别人往上爬是悠久的传统，没办法，位置就那

些，自己要上就必须别人倒霉，自己上了又得担心别人觊觎。张鲸将皇帝的心思传到外廷，接替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和冯保有过节，立马指使言官山东道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弹劾冯保。深文周纳是言官的专业，何况冯保这些年来毛病很多，于是两位言官洋洋洒洒罗列冯保当诛的罪名。皇帝立刻降职，令冯保去南京新房闲住，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其他来源不明的财产没收。皇帝对这位劳苦功高的忠仆没有把事做绝，就在万历帝拟职处分冯保时，心中积年累月形成的畏惧感还没有消除，对出主意的张鲸说：冯伴伴来奈何？张鲸给他壮胆，说皇帝的旨意，他再狂也不敢违抗，万岁爷就就这么干，没事。

冯保家被抄，他带着早就隐匿的财产以及亲随来到南京养老。从三座大山下解放的皇帝，此时真有翻身的快感呀。

万历帝轻易就能打发冯保，再一次说明明朝太监虽然很有权势，但仅仅是寄生于皇权下面，对皇帝本人很难有威胁。明帝国的控制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24节：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张居正去世时，皇帝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备极哀荣，这有点盖棺定论的意思。按常理说，如果此后不是发现他有谋逆、篡位之类的罪状，张家不应当被清算。张居正尽管生前权势熏天，但对皇室是十分忠诚的，这点想必皇太后和万历帝心知肚明，所以才敢放手让张居正去干。

但是，张居正一片忠心，却给皇帝的青春期带来了难言的心理创伤，从理智上万历帝知道张居正所做的一切是为自己、为大明，但情感上受不了身为帝国至尊十来年处在辅臣的阴影下。现在，这个人死了，皇帝长舒了口气，紧接着便是报复。将生前对其尊重有加的老师踩到脚底下，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才能获得一种发泄的快感。

自古帝王多薄恩，但万历帝对张居正翻脸之快，仍出乎人的意料。

万历十年六月份居正殁于京师，当年十二月冯保被驱逐到南京闲住。御史李植等上疏弹劾冯保时，并无一句涉及张居正。这些言官聪明得很，他们知道皇帝已经讨厌了冯公公，但对刚刚风光大葬的太师张居正态度如何，心里没谱，这张居正对社稷江山的功勋远非冯保能比，而且位居首相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一上来就攻击张居正，闹不好会引火烧身的。

看到万历对冯保的处置，再看到张居正重用的门生兼同乡曾省吾、王篆被免职后，善于揣摩上意，对政治气候极度敏感的言官们这下知道了，皇帝心中很烦张居正，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现在立功的机会到了。

说到工部尚书曾省吾，我再饶舌几句。这人少年科第，仕途顺利，且才能出众，很有政声，因为门生和同乡的关系被张居正重用，在当时也属正常。张居正老爸在儿子进了翰林院后扔下考篮，而曾省

吾的老爸矢志不渝，在儿子中进士后九年自己终于会试高中，儿子倒成了科第上的"前辈"。当然父子之伦重于科甲资格，按规矩儿子要称呼父亲的同年为"年伯"，等曾省吾当了兵部侍郎时，和他父亲同届的"年伯"们，因为入仕晚了九年，好几位是他手下的郎官（司局长），可这位曾侍郎对自己的部下兼科场晚辈恭恭敬敬，修父执之礼毫不含糊。从这则轶事可略知曾的为人。但那时的政治斗争以人划线，跟对人是最重要的，和品行政绩的关系不大，皇帝要清算张居正，他当然逃不掉。

十年十二月，朝廷将镇守北京东北门户的蓟镇总兵戚继光调到广东，理由是"继光不宜于北"，而真实的原因是他和张居正关系过于亲密，张十分信任他，他对张心怀知遇之感。这样一个张居正的"余党"怎能拱卫京师？三年后，一代名将戚继光郁郁而死。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一马当先，上疏把矛头明确对准张居正，列举他十四大罪，说"贪滥潜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等等（《神宗实录》），反正是常用的栽帽子、抓辫子、打棍子那一套。

此奏章正合皇帝心意，皇帝亲笔批示："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圣恩。"（《神宗实录》）尽管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同时还批示"不必追言往事"。但万岁爷的心思早让言官们看清楚了，这恶人要留给臣子们做，言官们争先恐后上书弹劾张居正，追言往事。

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皇帝下旨削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官衔和文忠的谥号。--要把居正打成"文奸"才罢休，这"文忠"当然不合适。此时距张居正死才七个月，而张家的灾难刚刚开始。

第25节：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张居正当政时，满朝文武争着向其谄媚奉承，以此邀宠争功。而今看到皇帝要清算张家了，一帮官员特别是科道的言官，马上跟着皇帝变脸，以弹劾张居正来表明自己和张居正划清界线，并博取皇帝欢心。

不要过分责备这些人的势利和丑陋，连皇帝都变脸那样快，何必苛责臣子。拍张居正的马匹和弹劾张居正，立场迥异目的相同，都出于利益的考虑。帝制下的政治文化催生和鼓励墙倒众人推，这也是此种文化下官员们死抱权力不愿放手的根本原因。

大凡一个或一群重要政治人物被打倒、否定，伴随的必定就是帝国周期性的平反游戏，那些当年因反对考成法和张居正"夺情"的官员，被重新起用，方可更加证明否定和清算张居正大快人心，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除了和张居正同一天死去的刘台外，当年罢黜、廷杖并声明"永不叙用"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重新回到官场。反正坏事都是死去的"权奸"张居正干的，而皇帝本人轻描淡写地承认，"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

清算张居正就必须清算他在位时的亲信，可谁是他的亲信呢？公认的工部尚书曾省吾、左都御史王篆、先后三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等重量级人物被处罚，众位言官多数都拍过张居正的马屁，有些人是因为隔得太远没法亲近首相而已，这回互相攻讦对方是张居正的余党、走狗，来标榜自己的刚正。连万历帝也开始讨厌这些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言官，下旨道："在前权奸结党行私，科道官寂无一言，及罪人斥逐，却纷纷攻击不已。"皇帝尽管看到这类人的无耻，但他却需要这类无耻作为自己的工具。

最无耻者莫过最先向张居正开炮的御史杨四知，他本来是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朱琏、王篆得到重用，这回攻击张居正最积极，而且上

疏胡说八道，完全是欲加之辞。比如他说张家有银火盆三百架，众位公子打碎玉碗数百只。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反问，"此孰从而见之？"还说张居正回家葬父时，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一个人再奢靡如此也不合常理。最可笑的是他"假设"了张居正的大罪，说现在皇长子诞生，加恩大臣。如果居正还活着，必定进侯伯加九锡--这和曹操一样的待遇。沈德符评论道："从来后宫诞育未有恩及宰辅者，有之实自江陵身后始，有识者颇以为非。然则杨何不明纠当事之政府，而追忖朽骨之权臣也。"因为弹劾居正的首功，杨御史外放数任巡抚，而升为大理寺左少卿（最高司法监督审核机构的二把手）。后被别人揭发是张居正余党，被罢官。

在这场清算风波中最倒霉的是真定知府钱普。张居正回家葬父路过当地时，钱知府特意打造了一顶超长型豪华"房车" --一个带套间的大轿子，里面有床，还可以藏侍应奴仆。居正大为高兴，准备提拔他，因为钱的资历尚浅就稍缓一会，可关键时刻钱知府丁忧回家守制，等守制期满回来时，张居正已经死了。大家争着弹劾张，钱知府那种拍马屁的独特创意被纠出来，在官员考核时以"不谨"罢免。真是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骚，这拍马也要讲运气。

最悲伤的白发老母

张居正葬父后，母亲赵氏健在被接到北京奉养几年。张居正死时，赵氏已是八旬高龄，和儿子的灵柩一起回到江陵老家。母亲送走儿子已经够悲伤的了，更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灾难。大功臣的儿子转眼变成大奸臣，家产被籍没，孙子被逼死，真真是寿则多辱。

赵氏当年进京时可风光了，因为张居正被皇帝数次催促，先行火速进京履职，赵氏随后慢悠悠地走水路。对首相的老妈沿途的官员巴结唯恐不及。到了河南，快过黄河时，从没出过远门的赵氏对婢女说了一句：如此大河，过河会不会很害怕。这话被传出去了，有人告诉老太太，过黄河还早着呢？到那时再向您禀报。等快到北京时，老夫人又问了一句啥时候过黄河。随行的告诉她早就过了。原来河南地方

官将船相连搭成浮桥，勾连南北，浮桥上覆盖着黄土，插着杨柳。老太太的船从浮桥旁经过，毫无知觉，还以为沿着一个小湖的岸边行进。等座船到了潞河，进入通县地面，要下船走旱路了。正值大中午，天气很热。通县的知县张伦招待老太太，就摆了些绿豆粥、蔬菜、蕨笋，给护送的奴仆差役们则供应大鱼大肉。他知道一路上太夫人每天都被地方官用鱼肉招待，早就吃腻了，于是奉应解渴、清爽的饮食给老太太。老太太大为高兴，进了北京给儿子张居正说："一路烦热，到了通州一憩，才有如游清凉国。"拍好老妈的马屁比拍儿子本人还管用，第二天张居正就提拔张伦为户部员外郎，分管仓库和粮食储备，这可是大美差哟。这个通州地方官，举人都没考上，是拔贡。--一些资格老有名望的秀才，选拔到国子监称"贡士"，贡士也可能被选出来做县官，但概率太小了。

第26节：最悲伤的白发老母

高寿的老太太哪想到人生的暮年要目睹家族这样大的变故。

就在大家都攻击张居正时，从东北移封到湖北江陵、已被废黜辽王王妃进京告状，说当年查抄辽王府，数以万计的财宝，都给张居正拿去了。这辽王自小就和张居正认识，两人有扯不清的恩恩怨怨。此人袭了王位后，放纵骄横被地方官告了状，废王爵抄家，那还是万历帝老爸隆庆在位时的事情，首辅是高拱，内阁的决定权不在张居正那里，但张居正在旁边煽风点火倒有可能。现在账都算到张家头上，而且说辽王府财宝都进了张家，爱财如命的皇帝心动了，派刑部右侍郎丘橓去江陵抄家，按明律，抄家只有三大罪：谋反、叛逆和奸党，显然居正都够不上。几位内阁大僚此时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胸怀--也许他们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首辅申时行关照丘侍郎"圣德好生"，次辅许国也表达同样的意思。后来也入阁的于慎行，在张居正当权时得罪了首相。刘台被罢黜时，大家都想瘟疫一样躲着他，于独自去看刘台，张居正知道后很不高兴。居正"夺情"，他表示反对。张居正问他：我一向待你不薄，你怎么做呢？于慎行回答，这样做正是因为先生厚待我。随后他告病归乡，居正死后复出。现在他不但没落井下石，而写信给丘侍郎求情："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

如此情理交融，但感动不了丘侍郎的铁石心肠。

世上总有一些靠整人、害人来邀功的酷吏，张家很不幸所碰到的丘侍郎就是这样一位，不是酷吏，估计皇帝也不会派他来完成这样的重大任务。这位邱侍郎是山东诸城人，康生的老乡。他曾经不讨张居正的欢心，现在解恨出气的机会来了。朝廷抄家的钦差来之前，那些原来巴结张家无所不用其极的知府、知县，现在争着立功，先去把张

家的门封了，里面的人还没有走光，但也不能擅自出门。等十几天后邱侍郎来了，启开封条一看，已经饿死了十几位，好几位都是儿童。

抄出来的财宝没有达到期望值，于是就对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认定他们事先转移了财产，拷问之下，只好乱咬一通，说有大量银两寄存在曾省吾、王篆几家，如此又可以抄曾、王两家了。--那时候国际交流不多，国际贸易不发达，天朝大国也就和臣服于自己的周边藩属国来往，否则的话以张居正的权力，生前让家中银两都存在外国银行，几个儿子也别考进士当大明朝的官，干脆都去国外留学，估计万历帝和丘侍郎一点办法都没有。引渡？只要不是藩属国，谁听他的。

张居正的大儿子敬修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二儿子懋修投井绝食被救过来。张敬修临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讲述了被抄家的全过程，惨状和父亲在世时的显赫对比太强烈了。书中道："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草木，岂能堪此！"要死的人也不怕酷吏了，张敬修咒骂道："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惨烈。"遗书最后对继自己父亲为首辅的张四维表达了怨怒："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很明显张家认为幕后指使者是张四维，但有人认为抄家时张四维已经丁忧在家，怎么能遥控局势呢？他可没有张居正回江陵葬父时依然控制朝局的神通。张居正是张四维的恩人，居正和四维的亲舅舅、当过宣大总督后任兵部尚书、一手促成鞑靼俺达部落入贡受封的王崇古交情很深，所以张四维才能仕途顺利，壮年就入阁当了大学士。但张居正总把他当成晚辈和下属对待，他心里不舒服，有怨气是真的。张居正死后，又是他首先联合宫内太监，扳倒居正的政治同盟冯保，从而开启了清算张居正的大幕。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张家把

账算在张四维头上。其实真正的幕后指使者是当朝皇帝，可对皇帝哪敢公开表示怨恨？

张家长子自缢，饿死家人十余口的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哗然。多数人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的，申时行给湖广巡抚写信，要求网开一面，丘侍郎的上级、刑部尚书，也就是那位被张居正重用治理黄河卓有成效的潘季驯看不下去，上疏皇帝说"治居正狱太急"，"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皇帝看后不高兴，善于窥察的御史李植马上弹劾潘，潘季驯被削职为民。但对众大臣的求情，皇帝总得给个面子，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养老太太，几个还活着的儿子都充军"烟瘴地面"，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对张居正所说"看护先生的子孙"。目睹如此骨肉惨状，老太太哪有勇气活下去？一年后赵氏在悲伤中死去。

办大案要案有功的丘侍郎回京后升任左侍郎，从副部长变成常务副部长，不久后又升任南京吏部尚书，寿终正寝，赠太子太保，酷吏的下场很不错。

第27节：改革家的宿命

改革家的宿命

张居正到底没能挣脱改革家的宿命，和他的前辈商鞅、李斯的下场差不多。只不过商、李亲身遭遇惨祸，张居正报在子孙而已。

中国的帝制时代，改革者本人除非掌握最高权力，否则就难免被清算的命运。"良相"行改革之法，像曹操这样完全把皇帝当成手中的傀儡，而自己的儿子干脆篡位，才免于身首异处或身败名裂。其他的"良相"，不管自己手腕多强硬，见识多高远，权术多娴熟，只要是依靠皇帝而改革，很难善终，为何？因为改革得罪的人太多，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太大了。而支持他改革的最高统治者，个人态度太容易发生变化，改革不是由制度而是由帝王进行保驾护航，不可知的风险太大了。

改革总是利益分配的再次调整，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猛烈反对，试以张居正为例。

他实行考成法，提高了行政效率，控制了言路，得罪的是大多数文官特别是监察官员。黄仁宇对此评价极为中肯："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自己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和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就随之付诸流水。"

他进行土地清仗和推广一条鞭法，得罪了大肆兼并土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他为了节省财政支出，规定外戚封爵不许世袭，及身而止，得罪了后宫和外戚，而且对皇室宗族的岁禄和田地进行整顿，得罪了宗室；他进行机构和人员精简，裁减冗员，得罪了底层官员；他整顿驿站，不许官员任意旅行时免费使用驿驰，得罪了大多数在任和致仕的官员；他严令不许滥增学额，对各县生员人数严格控制，不许私人开办书院。--就如日本幕府时代有无数不治产业的落魄武士一

样，明帝国有许多当不了官的落魄文士。这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享受免赋税种种特权，如果不去做工、种地、经商，必定联合起来利用对知识的垄断，包揽词讼，左右地方的舆论，张居正的这项改革和天下的读书人作对。而且作为传统的制度培育出来的精英，张居正所要改革的正是促使他仕途成功的旧制度，这几乎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战，所用的方式难免以毒攻毒，饮鸩止渴，诚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法对根本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那么大的政治构架下的行政、财政改革就必定人亡政息。

张居正改革所得罪的人，全是手中掌握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的人，他们有强大的能量。而谁是改革的受益者呢？当然是国家，可国家是一个很难人格化的政治概念，具体说来受益者，一是大多数被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不得不抛家舍业去做流民的小老百姓，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能直接给张居正提供支持；还有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是皇帝，改革能富国强兵，延续国祚。可皇帝个人是容易变脸的，张居正作为难免会伤害他的情感和尊严，前文已做过分析。所有被得罪的既得利益者，在观察皇帝，皇帝态度一变，他们就像马蜂一样群涌而上。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比起张居正，王安石虽然被发配到金陵闲住，新法被废，但个人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有保证，那是因为中国所有的王朝中，宋朝的皇帝为政最宽厚，张居正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居正被清算后，几乎所有的新政都废除，大明又按老样子运转。崇祯在帝国即将崩溃时，想起了张居正，感叹一百个庸相抵不上一个救时宰相，可惜已经太晚了。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宰相给了大明，大明皇帝没有珍惜，上天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

第28节：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

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

万历即位后，平反了一桩明王朝历史上最大的集体冤案，下诏为"靖难"中为建文帝尽忠而惨死的诸臣建庙祭祀，如徐达的长子徐辉祖、被诛杀十族的方孝孺以及卓敬、卢迥等人，并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

终明一朝，总在不断地制造冤案然后平反，再制造冤案再平反循环。一般说来冤案平反的周期并不长，有些是制造冤案的皇帝自己"拨乱反正"，有的是先帝死后，新皇帝登基后，马上用平反来收拾人心，也就几十年左右。而建文朝诸忠烈被杀是十五世纪初，此时到万历平反，已是十六世纪末，将近两百年，时间也太长了点。

为什么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才给他们平反?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帝系在明成祖朱棣那里拐了弯，发生变故，帝位从长房建文帝那里转移到第四房燕王朱棣那里。朱棣不起兵"靖难"夺了江山，他的后裔不可能当皇帝，万历也顶多是个饱食终日的藩王而已--明朝的历史一旦改写，有没有万历帝朱翊钧这个人存在还难说，万历帝当然要感谢自己祖宗起兵篡位。

朱棣当年以"靖难"、"清君侧"之类的名义造反，攻陷了南京城，建文帝化装成和尚远遁，朱棣谎称建文已经自焚致死，自己便坐了皇位。他如此做是想极力宣扬自己不是篡位，而是合理合法地继承皇位。这显然是在玩骗人的把戏，如果自己不想篡位，当时建文的儿子还在，为什么他不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呢? 而将人家儿子禁锢了半个多世纪。朱棣无论如何解释，也违反了明朝最重要的政治程序--帝位的嫡长继承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严重的违宪行为。所以刘伯温的儿子刘璟被朱棣抓获后，依然称朱棣为殿下而不是陛下，而且说："殿下百世难逃一个篡字。"

因此对成祖朱棣来说，帝位继承的不合法是他一生最大的伤疤，谁揭这个伤疤将会得到最残酷的报复，由此也能说明他为什么要诛人家十族那样残忍。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说道："文皇（朱棣谥号为"成祖文皇帝"）诛杀忠义，不遗余力，虽从来待帝国巨憝，未有若此者。"当时建文朝忠臣被杀后，儿孙或被杀或充军，妻女被发配到教坊司（主管特殊行业的机构）当妓女。张怡举例说，茅大芳的妻子在教坊司被凌辱致死后，朱棣御笔批示："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黄子澄的四位女亲属，被二十几个汉子轮奸，怀了身孕，生了男孩令作妓院的小龟奴，生了女孩，朱棣亲批："由他不得，长到大，便是一个淫贱材儿。"--这哪是文皇帝的作派，分明是厉皇帝、炀皇帝的作派。

如张怡所说，朱棣对这些忠臣比对敌国的大奸大恶还要狠毒，这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和敌国战争，俘虏敌国君臣，这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甚至加以赞扬的壮举，当然可以对俘虏宽厚以示仁义。王朝更替也很好解释，就如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说自己是天命所归，因为元政紊乱，元朝统治者贪婪残暴是事实，起义兵解万民于倒悬，是替天行道，所以没必要对俘虏那么凶狠。而自己闹家务事，叔叔篡了侄子的位，不能说天命已移，也不能说替天行道。只能说侄子被奸臣们蛊惑、左右做出傻事，起兵是为了保卫祖宗留下的社稷江山。

那么，要证明"造反有理"，自己不是篡位，要把罪过推到建文帝的臣子身上，是他们离间皇室骨肉，是他们搬弄是非，因此必须严酷镇压。

朱棣的篡位和对建文朝忠臣的残害，是留给他后代子孙最大的历史包袱。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即位，都不能也不敢怀疑自己祖先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定性，否则的话就说明自己屁股下的龙椅来路不正，简而言之，当年造反有理不容怀疑。尽管包括皇帝在内心里都明白，那些被成祖残酷迫害的建文旧臣都是忠义之士。在最推崇道德礼法的大明朝，一群道义上最值得人尊重的士人，其冤屈却没人

敢为其鸣冤。--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平反，亦非一般的政治案件翻案，而是直接动摇皇权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事件，包括皇帝在内没谁敢轻易作主。

第29节：神宗短暂的勤政

但血迹总在时光中一点点被冲淡，对当时朱棣当皇帝的合法性质疑也一点点在冲淡，因此朝廷对建文君臣的看法悄悄地发生改变。先是英宗复辟后，想到自己被弟弟景帝囚禁的滋味，将心比心，释放了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由于长期与世隔绝，这位龙子凤孙分不清猪牛。但这只是人道主义关怀，对"靖难"的政治定性，都得小心翼翼回避，不能涉及。可是，有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方孝孺的人仍这样然蒙冤，似乎在向整天喊忠孝的文臣们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向胜利者低头，不要对失败者愚忠，造反只要成功就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个结对朱棣以后的每个皇帝来说，解不开就有后遗症。比如武宗正德皇帝荒唐异常，不把祖宗江山当回事，野心勃勃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理由和当年朱棣相同，真是有样学样。如果不是王阳明及时剿灭，宁王真的坐了江山，谁敢说他是篡位呢?

到了万历帝时，距朱棣篡位已经近两百年了，皇帝这把龙椅，当年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还是合法继承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让不合法变成了合法。这有点像一个人占有某份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长期无人提出异议，最后相关民事法律认可他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帝国已进入暮年，当政者最大的希望是利益格局稳定下去不被人打破。此时，就得大力提倡方孝孺对建文帝的赤胆忠心，也需要一再强调曾被自己祖先朱棣破坏的程序法。也就是说，当年自己的老祖宗造反有理，现在造反有罪。如此，为方孝孺等建文朝忠臣平反并修纪念碑，既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且时机也成熟，对政局不会有负面影响。

万历帝本人对建文帝非常感兴趣，他登基后多次问张居正建文帝最终下落，是不是真的去当和尚了。而且让张居正将一首传为建文所写的七律抄录进呈。诗中说道："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万历和建文性格有些相似，优柔寡断而文才出众，这大约也是为建文忠臣平反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

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政治需要。而恢复被朱棣削夺的建文年号，追谥建文为惠宗，也就是说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承认建文是合法的皇帝，彻底了解这一历史公案，则推迟到崇祯年间，离明亡没几年了。

张怡评论朱棣对待建文忠臣的家属 "惨动天地"，"以见烈皇帝（崇祯）殉社稷，死事寥寥，非无故也。"当年祖先那样对待方孝孺们，现在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却希望臣子们都学方孝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第二章 万历帝的懒惰

万历帝清算张居正后，亲政时正值弱冠之年，精力充沛，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事与愿违，最后他躲进深宫，不见众臣，成了历史上一位最懒惰的皇帝。

让万历帝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冷，导火线似乎是因为在册立东宫这个国本问题上意见分歧，导致了彼此对立。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惰性已经深入到这个帝国的骨髓之中，无药可救。

神宗短暂的勤政

明神宗万历帝被史家评价最大的特点就是懒，可这个少有的懒皇帝曾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短暂时光。他不到十岁登基到张居正辞世，这十年在贤母、严师、忠仆的共同调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着做一个尧舜之君。但这段时间他的一切行为并不是自主的，所以算不上勤政。

现在，老师死了而且被自己清算，大伴冯保被赶到南京去了，老妈也基本不管自己了。万历帝一身轻松，自己当家作主的滋味真好，而且他已经二十一岁了，有这个能力钦裁军国大事。尤其对于那些暗地里认为自己对张居正过于刻薄的人看看，没有张屠夫，咱也不吃混毛肉，帝国在自己的治理下，将会更加强盛。

从两件事可以观察到青年万历曾经是多么想振作一番，重新找回开国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雄风。

一是两年内四次谒陵。明朝的皇帝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孝陵，建文帝不知所终，代宗被复辟的英宗削夺皇帝号葬到别处外，其余都葬在北京城北面昌平的大山中，此处紧靠着长城，是守卫都城防御北方胡骑最重要的防线。清代的李渔曾说北京周边的风水，昌平最佳，至今去昌平，以"龙脉"命名的旅馆、温泉、楼盘到处都是。明朝皇帝选在此处作死后安葬之地，固然有风水的原因，但我以为也有激励后代子孙守卫江山社稷的成分在里面，帝国最大的威胁在北面，如果这道防线受不住，祖宗的陵寝马上沦于敌手，如何去见列祖列宗？这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后来的崇祯帝在闯王锋镝逼近时，迟迟下不了撤离到留都南京的决心。

第30节：申时行走钢丝

万历帝谒陵的同时，是为自己百年之后选吉壤，但真实的原因是想检阅武装部队。今天北京城到十三陵，走高速不到两小时就可抵达，可在那个时代，皇帝出巡到一百来公里的京畿重地，非同小可，一路要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随行的是驻扎在皇城的御林军。皇帝很重视这支禁军，年轻人喜好谈兵弄武本来就很正常，何况皇帝是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一点万历帝和正德帝相仿，没事的时候跑到禁军的驻地观看操练。出城谒陵时，大军扈从，旌旗如云，这才能体会到当皇帝的感觉，就呆在紫禁城里，整天对着太监和宫娥，批复那看不完的奏疏，多没劲呀。这也是正德帝想方设法要逃出宫去做统兵官的原因。

皇帝重视武备，本是好事，但大臣们却担心出现意外事件，万一皇帝有点闪失，谁担当得起？再说出巡频率太高也对官吏、百姓惊扰太多。按文臣的心思，皇帝最好是个可以用程序控制的机器人，整天只会在皇宫批阅奏疏，和大臣商量国事，别的一概不干。首先是兵部尚书张学颜上奏，认为皇城内的禁军由太监管理，兵部不能检阅，科道官不能监察，万一图谋不轨者哗变怎么办？这当然是为皇帝安全考虑，但不能不说是在强调兵部的职权--明朝兵部尚书都由文官担任，权力极大，帝国内不能让一兵一卒游离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外，这种文人治军的思想其实蛮先进的。而十三陵临近蒙古草原，言官们以蒙古部落蠢蠢欲动吓唬皇帝，恳请他不要再谒陵。万历帝不像正德帝那样荒唐放肆，于是听从了臣子的建议，解散了禁军停止了谒陵。

第二件事是祈雨。万历十三年（1585）北京及周边地区久旱不雨，皇帝决定去天坛祈雨，为表示心诚，斋戒三天，并步行到天坛，并在大太阳虔诚地跪下，向上天做检查，表决心，决定要亲贤人远小人，一心扑在工作上，请求老天爷原谅。二十余天后，大雨倾盆，人们以为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

申时行走钢丝

张居正死后，接任首辅的是山西人张四维，可首相的椅子还没坐热，就丁忧回家。快丁忧期满，重返朝廷时，张四维死在家乡。二张接连离开中枢后，申时行当了八年的首辅，和他一起在内阁的还有他的苏州同乡兼同年、后来接任他做首辅的王锡爵。申是吴县人，王是太仓人，两年都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会试时王锡爵是第一名，殿试时申时行是头名状元，王锡爵是第二名榜眼。科举名次入了一甲，官当到首辅，这恐怕是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最高的愿望，这两人都实现了，他们可算是明朝文官制度培养的精英中的精英，既有学问才气，又有治国能力。

这申时行科场、官场都一帆风顺，少年得志的他完全有牛气冲天的本钱。可恰恰相反的是，和敢为天下先不怕别人议论的楚人张居正相比，这位吴人性格柔和，善于平衡各种矛盾。这样的人只埋头办事，对皇帝、对上司没有咄咄逼人的威胁感。因此张居正当国时，"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藉蕴不立崖异，居正安之。（《明史·申时行传》）"在张居正推荐下，万历六年申时行入阁。

万历帝清算张居正，是申时行做首辅后的第一个考验。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申时行当然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维护皇帝的权威，不敢自作主张。批倒批臭张居正是皇帝决定的，申时行只能执行。但申时行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小人，张居正的功勋以及张居正的知遇之恩，他并没有忘记，想尽一切办法写信给具体办案的官员，希望给张家一些人道主义的关怀，尽管效果不明显，但在年轻皇帝一定要清算张居正来立威的大环境下，申时行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他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中国人喜欢算历史旧账，喜欢以人划线。申时行是张居正提拔的，朝廷官员普遍认为他是张的人。张居正被清算的一条罪状是钳制言路，这一下言官们扬眉吐气了，特别是那些在清算张居正这场斗争中立功的言官，更是气焰嚣张。那些曾因夺情上疏而得罪张居正的官

员，恨乌及屋，觉得内阁里的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以及几位尚书，都是当年张居正比较欣赏的，不应该再留在重要位置上。那位曾被廷杖的吴中行，上书弹劾申时行等人，还摆好了不怕丢乌纱帽的架势，说现在这些辅臣还把臣等张居正当年的仇人，看成了敌人。吴中行可是当年反对张居正的英雄人物，他这样一说博得了舆论的喝彩，申时行的压力可想而知。

吴中行这类不畏权势的官员，当然有值得敬重的一面，但这类人的毛病是总觉得自己真理在握，别人都是心存不良的小人。这样的君子有胆量，说话的调子也很高，可治国不能靠这样的人。万历帝不是糊涂蛋，他一方面下诏挽留吴中行这种反张英雄，来证明清算张居正的正确性；但另一方面他继续让申时行等人留在内阁，满朝大多数高级干部是张居正当首辅十余年里成长起来的，全部驱逐，就靠那些反张斗士，这政权根本没法正常运转。

第31节：少壮派的价值

少壮派的价值

万历帝虽然需要申时行这些元老替自己扛活，但他不愿意辅臣们的权力太大，尽管申时行小心翼翼摆出一副听话的小媳妇模样，但万历帝还要不时敲打申时行等人，他被张居正压抑得太久了。

提拔少壮派，来压制元老派，往往是皇帝或一把手的惯用手法，万历帝也是这么干的。

万历帝最器重的少壮派御史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这三人在清算张居正、驱逐冯保的政治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目的达到后，万历帝还需要这些人来造元老们的反，使这些曾受张居正恩惠的大官们噤若寒蝉，对皇帝唯唯诺诺。有了万岁爷的支持，这些言官们更是鼻孔朝天，不把那些元老放在眼里。

当年张居正当权时，应天乡试的主考官高启愚出的试题照例是四书中的一句："舜亦以命禹"，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丁此吕上疏算历史旧账，说这是暗含让皇帝禅位给张居正的险恶用心。--凡是文字狱其实都是无耻文人出的馊主意，皇帝没这么敏感。这样的牵强附会实在太不靠谱了，吏部尚书杨巍驳斥这种谬说。万历帝毕竟不是清朝的皇帝，明白这种说法实在联想太丰富了，下旨训斥："言官论列，须审雅正，据实秉公，岂可逞臆造言，诬善乱政。"本来皇帝是让丁此吕调到京外，但他所器重江东之、李植等人跟进附和丁此吕之说，王士性更是弹劾杨巍阿媚阁臣，阻塞言路。这王士性学问是相当不错的，写过一本很有价值的人文地理书《广志绎》。几位少壮派言官结成统一战线，猛烈向元老们开火，皇帝还需要这些言官替自己冲锋陷阵。于是改变了初衷，留任了丁此吕，而让丁所弹劾的高启愚闲住--相当于保留级别却不管政事。这下，把一帮元老级高级官员惹怒了，他们认为皇帝偏袒这些造反派言官，以首辅申时行、次辅（第一副总理）许国以及吏部尚书杨巍上疏乞休，许国更是指出这帮御史

是"浮薄轻进好言喜事之人"，紧接着，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吏部两位侍郎、工部两位侍郎，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纷纷上书，挽留申时行，斥责言官。

这些少壮派言官可不是好惹的，明太祖当初用小官监督大官的监察制度，很有威力，李植纠集一帮言官，上疏说这些大臣挽留宰辅是树党。大臣和言官分成两派，互相攻讦，朝局乱了起来。

也许文官集团内部有一定的分裂和冲突，是皇帝愿意看到的事情，皇帝并没有立刻采取措施平息这种局面。因为曾治理黄河取得罕见政绩的刑部尚书潘季驯上疏为张居正说了两句公道话，李植揣测皇帝不高兴，上疏弹劾潘季驯，潘被削职为民。万历帝为了奖赏这些敢于冲锋的言官，亲自下诏给吏部，提拔李植为太仆寺少卿（正四品），江东之为光禄寺少卿（正五品），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从五品），在此之前，他们都只是七品御史。受到皇帝犒赏的少壮派，这下攻击弹劾那些元老的积极性更高了。以为自己以笔为刀，横扫千军，没有他们扳不倒的元老。

申时行等一帮元老们，久历宦海，经验老到，他们知道这些少壮派有皇帝的支持，气焰嚣张不可正面接招。就像《水浒传》中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样，不管洪教头如何张牙舞爪，气势汹汹，林冲以静制动，寻找对方的破绽。

前文曾说道，亲政后的万历帝摆出一副要有所作为的样子，万历十三年（1585）春夏之交华北大旱，皇帝步行到天坛，冒着酷暑求雨。按照董仲舒等人倡导的天人感应之说，凡有大旱等天灾，往往是上天对执政者示警，警告天子朝政出现了问题，那么不是从皇帝自身找原因，就是从臣僚身上找原因。御史中间也有看人看不惯李植等人趾高气扬的样子，江西道狱史蔡系周上疏弹劾李植，说"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他把大旱的原因归结为李植等人的乱政，以及原刑部尚书被冤枉。而且还把李植得意洋洋给众官吹牛皮的话讲给皇帝听。李植说皇帝呼他为儿子，对他如何如何宠爱等等。在同事面前

公开夸耀一把手和自己亲密关系，现在也是很犯忌的事情，皇帝知道了当然会不舒服。将旱灾和奸臣联系起来，也是瞎扯，可李植等人弹劾别的官员也是这样牵扯唯恐不及，真是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另一位御史孙愈贤跟着上疏，赞同蔡系周的观点。李植等人当然要回击，羊可立上疏攻击蔡、孙两御史是张居正、冯保的余党。一时间，朝廷又是互相攻讦，唾沫遍地，申时行这些元老当然支持蔡御史等人。

第32节：政治暴发户被皇帝抛弃了

皇帝看完双方的奏折，很生气，说朕正为旱灾忧虑，各位怎么就如此争吵不休？便出来和稀泥，给都察院一个手札，让都察院管好御史，说"谏官务存国家大体，何得以私灭公，挑激事端，淆乱国是。"皇帝不好正式下诏谴责弹劾李植的蔡系周等人，因为御史就是干这活的，他重用的李植等人在当御史时弹劾别人比这过分得多，总不能双重标准太明显。同时在羊可里的奏疏上御批，说冯保、张居正的案子是朕独断的，早就结案了，不能借奸党攻讦。看起来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实质上是让大臣们不要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李植几人在朝臣中是少数，再争论下去会吃亏的。

少壮派一旦得志，不会见好就收。李植等人并没有看到皇帝的和稀泥是在保护他们，树欲静而风不止。几天后，京城流传一份揭帖，说大学士许国授意蔡希周、孙愈贤攻击李植等人。朝中许多人怀疑这张大字报是李植等人写的，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上书，影射李植等正得圣眷的少壮派，说有一些人想将万历十年前，和张居正共事的人都说成是同党，希望全部赶走才罢休。这说到了问题的实质，万历帝对所有当年在张居正手下干过的大臣都不信任，但全部赶走又没这个气魄，政权还得靠老练的文臣来维持运转。

皇帝假装让锦衣卫去侦缉写大字报的人，但这只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几位不满少壮派的御史继续上疏为潘季驯鸣冤叫屈，万历将这些人罚俸，可还是遏制不住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势头，皇帝很恼火。

政治暴发户被皇帝抛弃了

老谋深算的首辅申时行在等待中终于看到了少壮派的破绽，立刻出手给予凌厉的一击。

皇帝给自己造陵墓，从秦始皇开始，就是帝国的一号政治工程，年年轻轻的万历帝尤为重视这事。十三年八月，接受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建议，派人去昌平大峪山勘探陵墓地址，申时行也赞成徐尚书的建

议。李植几位少壮派一看，机会来了。这首辅是元老派的领头人，把他赶走，换上一个和自己交情不错的，那么朝政就基本上可以操纵了。以该地有大石头，并非吉壤为由，和江东之、羊可立这三人帮联合上疏，说"此地若是吉壤就不应当有石头，有石头则应另行卜地，徐学谟以个人意见当成公议，申时行因与其是故旧亲戚（儿女亲家）而赞许徐学谟的建议，这都不是大臣谋国尽忠的行为。" --反正，什么事都可能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武器。

申时行知道选择大峪山做地宫是皇帝自己的主意，他知道这点对方攻不倒自己。这回上疏为自己申辩了，他说，皇帝起初巡察此地时，李植、江东之不提出异议。过了两年，突发此议论，他们借此想陷害我的意图太明显了。这下皇帝没法庇护李植了，下诏训斥说，阁臣的职能是佐理政事，怎能以风水师的要求去责备他？并重申吉壤是自己选定的，安慰申时行，李植三人被罚俸三年。--不过历史很有趣，坟墓最不吉利的就是被掘，后来万历帝葬于大峪山的定陵是十三陵中唯一被挖掘的。

事以至此，三位少壮派没有觉察出时势已发生变化，还想一不做二不休，采取强攻，把申时行拉下马。他们上疏一方面推荐通晓风水的侍郎张岳、太常寺卿何源重新勘察大峪山，另一方面极力推荐李植的老师王锡爵出任首辅。但他们低估了王锡爵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品德。此时，李植三人除了皇帝喜欢，在文官集团中几乎成为大多数人所不齿的小人，王锡爵已经是离首辅只有一步之遥的大学士，如果此时接受学生的推荐，那就等于和大多数元老为敌，必将为士林耻笑，而且皇帝最不喜欢老师和门生拉帮结派。三人推荐王锡爵等于把人家架到火上去烤，王锡爵当然没那么傻，立马上疏辞职来撇清自己，说："大臣不能帅群臣，当去；师不能训子，当去；老成而为恶少年所推，亦当去。"直白地把自己学生名之为"恶少年"，而且对同年兼同乡的首辅申时行深表同情和理解："今大学士申时行泊然处中，唾面不拭，以强陪诸臣之颦笑，不过为重国体，惜人才耳。"王锡爵认为李植

之流把申时行为大局忍辱负重当成软弱可欺。王锡爵的高洁更显出李植等人的龌龊，一个连老师都以其为耻的官员，其个人信用可以说完全破产了，这下那些讨厌这三人的御史更是借势弹劾，皇帝看到了三位少壮派已经成为满朝官员的敌人，再庇护下去等于皇帝摆明要和众臣对立，万历帝当然不会这样傻，而且三人作为御用打手的价值已经利用完了。于是批示让三人都降三级，调到京外做知州或佥事，政治暴发户就这样被万岁爷抛弃了，从此淡出政坛，郁郁而终。

万历帝用李植等少壮派来达到制约元老，清除张居正影响，树立个人权威的目的初步达到，但不是完胜，而后遗症极为严重，这番纷争成为万历一朝各立门户的开始，后来的"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非为党争之局火上浇油罢了。万历帝看到这种局面无法控制，心灰意冷干脆消极怠工，不理朝政。这个"魔瓶"是万历本人打开的。

第33节：天下第一父亲的烦恼

天下第一父亲的烦恼

按照帝制时代一种常用的政治性比喻，皇帝是天下臣民的共同父亲，所以当臣子的动辄就说"君父"，皇帝对老百姓则称"子民"。不过这基本上是忽悠人的说法，把赤裸裸的统治与被统治、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装修成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哪有当儿子的食不果腹、死填沟壑时，慈祥的父亲还能安心在宫殿里花天酒地?

皇帝当然也是实际生活中的父亲，他最疼爱的儿女，必定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而非政治寓意上的儿女。皇室是天下第一家庭，皇帝则是天下无数父亲中的第一号。既然是父亲，就有寻常父亲的烦恼，儿女们能否健康长大，他们的教育，以及兄弟之间的和睦和遗产的分配，等等都需要皇帝操心。而且第一父亲比寻常父亲的烦恼大得多，因为他的遗产可不是一亩三分地和几间瓦房，而是万里江山和亿兆黎民。且皇帝的江山不能像寻常百姓的田地那样，可以平均分割给子孙，必须完整地打包留给下一个皇帝。--因此，皇位继承几乎是历代帝王最头痛的难题。

朱元璋早在开国之初就在程序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确定了嫡长继承制。由皇后所生的嫡传儿子继承，皇后无出，则由所有嫔妃中所生的长子继承。这种传长不传贤的方式当然有毛病，可能嫡长子的智力、德行不如其他皇子。但这种刚性的制度利大于弊，它最大限度地防止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否则的话，谁贤谁不肖，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所以由上天来选择，谁先来到人间谁就继承皇位，是最公平的。但皇帝对众多儿子，也会和寻常百姓一样偏心。尤其他有那么多嫔妃，所谓爱其母则亲其子，所宠爱的妃子生的儿子，总能最得皇帝欢心，比如汉武帝因宠爱钩弋夫人而喜欢和她所生的弗陵。皇帝最喜欢的女人往往不是皇后，也不是自己早年时所临幸的妃子，而经常是在御极已久，对身边无数的女人已经腻烦了，突然一个活泼可爱的女人

出现，点燃了皇帝的第二春。和最宠爱的女人生的儿子，基本上不会是长子，这就给皇帝带来了烦恼，在祖制和私爱之间，难以取舍。

万历帝一生中碰到的最大烦恼便是这种难题，"国本之争"--即谁是皇位继承人，困扰了朝局十数年，直接影响到万历帝和众臣的关系，也影响到整个明帝国的盛衰。

万历十年（1582）八月，皇长子朱常洛诞生，虚岁二十的皇帝后继有人，而且此时张居正刚刚死去两个月，皇帝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不用受到首辅兼老师的制约了，可谓双喜临门。

皇长子来到世上，非常偶然，他是万历帝"一夜情"的结晶。这也为"国本之争"埋下了隐患。

第34节：宫女中了头奖

宫女中了头奖

一天，万历帝去母亲慈圣皇后所居的慈宁宫请安，碰到了一个宫女王氏，这个宫女长得很普通。美女充下陈的后宫，只有一个成年男性万岁爷，这样的宫女要得到雨露沾润何等困难。可万历帝那天不知道怎么对这个普通的宫女突然有了性趣，匆匆临幸一把。--所有的宫女都是属于皇帝的性资源，就如猴王霸占猴山所有的母猴一样，皇帝这样做很正常。而世上中大奖的总是那些偶然花小钱买一张彩票的人，那些想通过彩票发大财的人却往往血本无归。好些嫔妃长门望断，用各种方式取悦皇帝，向送子观音祈福，都没有作用。

宫女王氏，想不到被皇帝临幸一次，竟然怀孕了。这种皇宫内的"小人物中大奖"的传奇，不止发生一次。当年宪宗被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万贵妃控制，和其他妃子怀上孩子后都被万贵妃想办法打掉。一次他偶然去宫内某个仓库，碰到一个来自广西的瑶族宫女纪氏在看守仓库，他兴致来了，临幸一把，意外地怀孕，上上下下的太监宫女瞒着飞扬跋扈的万娘娘，生下了一个皇子，便是后来的明孝宗。

万历帝知道宫女怀孕后，觉得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母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而自己却偷偷地把母亲身边的服务员肚皮搞大了。于是他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可太后李氏是何等厉害的角色？自己的身边发生这么大的事她能不知道？有一天，万历帝陪太后吃饭，太后问起此事，万历帝矢口否认，太后于是拿出皇帝的起居注。--上面详细地注有何年何月皇帝临幸某人，这当然不是宫内有无聊的八卦记者，如此做是对帝系血统纯正负责，否则的话有可能让龙子凤孙湮没于众人中间。如此看来，皇帝这个世上最大的公众人物，丝毫不可能有什么个人隐私。白纸黑字，无可抵赖。万历帝见此很是害怕，以为老妈要责怪自己。可天下的老妈一个样，不希望儿子胡闹，但如果儿子胡闹出孙子来，自家添丁，却又很高兴。太后说：我已经老了，还没有

能抱孙子。如果怀上的是男孩，那就是祖宗社稷的福分。然后又说了句：母以子贵，哪用得着分什么差别等级？--太后对怀上朱家血脉的宫女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因为她也是宫女出身。以后，她一直充当着王氏和皇长子的保护神。

于是，十年四月，王氏被晋封为恭妃，四个月后，皇长子出生。--我去乌鲁木齐出差时，看到当地有一个地名叫"一炮成功"，不知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典故。

王氏尽管意外生子，但万历帝并不喜欢她，万历帝宠爱的是郑妃。郑妃小万历四岁，长相漂亮自不用说，但这不是她受宠最主要的原因。皇帝富有四海，光靠美色是拴不住皇帝的心，何况再美丽的容貌也有年长色衰的一年。皇帝是天子，在宫内有绝对的主宰权，大多数嫔妃对他战战兢兢，生怕龙颜大怒。站在巅峰上的皇帝每天面对这样的嫔妃、宫女和太监，难免寂寞孤独。而郑妃不一样，她活泼而善解人意，而且能陪着皇帝一起读书，敢和皇帝开玩笑。孤独的皇帝需要精神上的慰籍，宫内的女人除了郑妃，别人不能提供这些。其他女性只是仰望皇帝的性工具，而郑妃有点皇帝红颜知己的意思。因此万历帝终其一生，都宠爱郑妃。

万历十四年二月，郑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其得君专宠的地位自然更巩固了。但满朝文臣，特别是申时行、王锡爵登大学士，看到的不止是这些，他们洞察了皇帝的内心，看到了皇位继承的变数。--这当然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国本论"始起

所谓"国本"，就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在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谁继承皇位。

前文说道，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和宫女"一夜情"意外所生，他并不很喜欢。对这点，老辣的首辅申时行洞若观火，就在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怀上孩子还没分娩时，害怕夜长梦多的申时行上疏皇上，请册立东宫。如果此时册立东宫，只能是皇长子。

万历帝心中另有算盘，说皇长子还太小，此事不用着急。当时皇长子已经五岁，万历帝大概忘记了，自己也是在五岁时，被父亲隆庆帝册立为东宫的。所谓年幼只是托辞，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这位大儿子。

十四年（1586）二月，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还是恭妃，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皇帝如此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显失公平。

由母亲的待遇，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大家为皇长子担忧。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他们要防患于未然，给皇帝一点压力，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

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指出皇帝偏心。他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恭妃诞育元嗣，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然后再封郑妃。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而且进一步发挥道："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以定天下的根本，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显然，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

第35节："国本论"始起

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不便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召见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皇帝过后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故特别加封。立皇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

疑君卖直、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到了明朝中期后，敢直白地骂皇帝，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

于是，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知县是正七品，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典史在主簿之下，不入流。

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杀头的一根筋官员，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被惩罚。北、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皇帝都不理睬，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

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热闹还在后面。

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

明朝的文臣上疏谏君，摆出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言必称孔孟，称祖制，说江山社稷，理由一个比一个充分。皇帝自然辨不过他们，利用皇权硬生生处罚他们，舆论上自己处于劣势，而且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你皇帝怎么办？换一拨人他们还是这样。

可以说，明朝虽然也有严嵩那样的一味奉承皇帝的佞臣，但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已经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大多数文臣只有行事方法的差别，在核心价值观上是一致的，比如申时

行，有人指责他柔媚事君，那是和王家屏等人比较而言，在立储君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同样不向皇帝让步，而是想办法斡旋。

因此，万历帝很痛苦。他明明知道让自己喜欢的皇三子继承皇位，是冒天下大不韪，没法向祖宗和臣民交待，但又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立皇长子为储君。而这件事还不像他爷爷嘉靖帝在位的"大礼议"。嘉靖尊本生父亲为皇帝，生母为太后，尽管惹起朝野非议。但毕竟有张璁、桂萼这样的文臣，从另一个角度帮皇帝解释。比如说为人君者不能将母亲当成臣子对待，因此还活着的生母应当有太后的名号，否则"臣母"同样违背礼法人伦。也就是说嘉靖帝那样做还能找到理论根据，哪怕有些牵强。而万历帝如果想将皇位给第三子，一丁点理论根据都找不到，因为这样，所以满朝文臣，没有一个敢明确奉承皇帝，提议立皇三子为皇储。

万历帝感到空前的孤独无助，而文臣们还在不依不饶地争国本。于是，他突然厌烦了这些让满口正义自己无法反驳的文臣。

惹不起你们朕还躲不起你们？曾有过短暂励精图治的万历帝突然开始躲进深宫，消极怠工。

究竟万历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史无明载。但应该是郑妃生了皇三子，众臣催促皇帝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后，万历帝懒得继续和众臣解释、周旋，开始了怠工。《明通鉴》记载，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十四年十月，上疏劝皇帝勤政被廷杖。那么可以断定，万历帝最晚在十四年四月已经开始怠工。张居正是十年六月去世的，也就是说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万历，真正自己勤政的日子只有四年。可见，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

万历开始还找理由，说自己身体虚弱，头晕目眩，免掉了上朝、日讲和祭祖。卢洪春上疏说："礼仪莫重于祭祀，疾病莫甚于虚弱，陛下春秋鼎盛，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疾病？臣下所闻，有些不一样。先前二十六日传旨免朝，说是骑马伤了额头，然后托病而讳言受伤。若真如此，陛下因为一时的驰骋之乐而忽略爱惜身体；如果像圣谕所说的

虚弱原因，那就是陛下贪图之床笫欢而不爱惜身体，危害更深。请陛下明示廷臣：若真有疾病，则当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贪图享乐埋下祸患；若不是因为疾病，就当下旨说明，不要矫饰引起猜疑。"

人吃五谷杂粮，都可能生病。万历帝也许是以生病为托词，但臣子这样说也太伤自尊了，不是说皇帝装病就是说皇帝贪图女色危害身体，简直就是父母教训一个装病不去上学的小孩一样。皇上焉能不怒，下诏为自己辩护说是真的病了，将卢洪春廷杖六十削职为民。

这一折腾，更坚定了万历躲避群臣的决心。

第36节：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英语名原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说这一年无关紧要，当然是以当时人的眼光看，此年无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看这一年，这一年在历史的因缘和演进中至关重要，否则黄先生不会从这一年切入来分析大明的政治运转。

这一年是万历由勤变懒的关键一年，也是大明由强变弱的关键一年。还有一个当时无人关注的女真青年，正在白山黑水间初露峥嵘。

这个人叫努尔哈赤，后来被统一中国的清朝尊为开国太祖。

明朝长期镇守辽东的是内附大明的朝鲜人李成梁，在中原王朝建立赫赫战功的朝鲜族将军，唐有高仙芝，明有李成梁父子。对辽东的女真各部，李成梁一直奉行的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乐见他们之间互相攻伐，消耗力量。可对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李成梁不但没有阻挡，反而助其一臂之力。

万历十一年（1583），归顺明朝的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在战乱中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也被俘虏。年轻的努尔哈赤长得仪表堂堂，颇有女人缘，李成梁的妻子"奇其貌，阴纵之归。"回到部落的努尔哈赤把尾巴夹得紧紧的，百般恭顺地对待李成梁，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成梁的儿子如柏做小妾，自称"奴儿"，把李成梁当成干爹供起来。而另一方面，厉兵秣马征服其他部落。十一年五月，偷袭尼堪外兰部落的图仑城得手，打响了建国的第一仗，满清称为"图仑兴兵"。尼堪外兰是当时建州女真中最强大的，一直臣服于明朝，丢掉图仑城后，首领带领部众逃到靠近明朝边关的鄂勒珲城，以为有了靠山，不惧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马不停蹄，一个个拔钉子似的，先攻下邻近的克栋鄂部的翁鄂洛城，浑河部的界藩城、栋嘉城、萨尔浒城，万历十四年又攻

克了瓜尔佳城、贝珲城、托摩河城。兵强马壮的努尔哈赤于是在这年年底剑指尼堪外兰的鄂勒珲城。如果按照平衡女真各部力量的原则，明朝应该支援尼堪外兰，遏制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但明朝在辽东的最高统帅、宁远伯李成梁已经被灌了迷魂汤，明军反过来擒获尼堪外兰的部众，送给努尔哈赤。万历十五年新年来临之际，灭了尼堪外兰的努尔哈赤已经成为建州女真无可争议的领袖，但此时他还没有实力和明朝摊牌，明朝也把他当成寻常的"夷酋"，继续让努尔哈赤袭父亲"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封号，并赐予岁币羁縻之。

对东北边境一个女真青年展露头角，北京城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注意，帝国周边蛮夷之间互相打打杀杀太平常了，比起谁继承皇位这个天下第一号大课题，一个骁勇的夷酋算得上什么呢？他们忘了，女真人从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克星，当年金人俘虏宋朝徽、钦二帝的故事史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了。等到万历四十七年，万历帝崩驾的前一年，努尔哈赤终于在沈阳告庙，控诉对明朝的"七大恨"，公开向明朝宣战，此时的大明和老皇帝一样，已经病入膏肓了。

第37节：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1)

顾宪成是无锡人，在一个亦商亦农的小康之家长大，兄弟中行三。万历四年二十七岁时中应天乡试第一名，也就是俗称的"解元"，万历八年中二甲第二名进士，授户部主事。不久，他请了三年家回乡奉养老母，直到十四年下半年才假满回朝，升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做到了副司长，这个司分管的是官员的勋级，人事档案以及因丧守制等事务，虽不如文选司权力大，但也很重要。尽管当时顾宪成文名已满天下，但在政坛上还没多大的动静。

这年二月，京察开始，都察院左都御史将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的名单中，京察"拾遗"指的是原来的考核有遗漏，不准确，让专司监察的科道官再议。显然，这是不给何尚书的面子。大凡工部尚书，必须要搞好和内宫太监的关系，因为工部主管工程建设，而宫内的建设项目是最多了，往往是工部官员和宫内管工程的太监一起勾结分肥。何尚书和大太监张诚很铁，张诚替何尚书运作，给事中陈与郊在授意下，上书将何起鸣和主持京察的辛自修放在一起评论，实际上是攻击辛而替何开脱，辛自修被攻击后托病辞官。御史高维嵩等人气不过，上疏弹劾何起鸣。正好万历帝听信了张诚的话，相信何起鸣怀疑辛自修，便责备高维嵩，说"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辄纷纷排击。"将高等人调出京外，一些官员又立刻上疏为高御史抱不平，遭到处罚。

顾宪成的上疏应当说是立场比较公允的，他主张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各务自反"，即每个人都反省，大家来找找自己的毛病。可万历帝看完大为生气，要求内阁拟票重重处理顾宪成和一起上疏为高维嵩鸣冤的王德新。首辅申时行开始还想和稀泥，票拟为罚俸--扣发薪水。万历帝认为处罚太轻，亲自起草处理意见，顾宪成被连降三级，贬为桂阳判官。

顾宪成曾经碰到同乡、内阁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出自己的疑惑："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的回答是："吾

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两人都看到了朝廷和民间意见的尖锐对立，但顾宪成认为责任在上面，是朝廷罔顾民意，和民间满拧。

这次贬官只是顾的一次挫折，几年后他又回到吏部担任要职。七年后他彻底得罪了皇帝，削职回家，完全淡出了政坛，一心一意讲学，成为东林士人的领袖，用舆论的力量影响朝政。此乃后话。

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

大明官员的道德标杆海瑞，他在万历十五年九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

由于朱棣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但掌握实权的自然是北京政府，南京的部院寺基本上是安排闲官用的。但饶是如此，南京右都御史仍是正二品的大员，政治地位很高。

海瑞这位高级官员辞世时十分凄凉，《明史海瑞传》记载，他没有子嗣，南京佥都御史王用汲去吊丧，只看到葛布做的帷幕，陈旧的竹箱子，虽寒士也难忍受的清苦情形，王用汲为之流泪，和同僚凑钱将海瑞装殓。百姓罢市表示对海瑞的哀悼，出丧时，长江两岸都是自发穿着白衣冠送葬的人，一路洒酒祭奠绵延百里。如此得民心的官员，万历帝也深有所感，加赠海瑞太子太保--属于从一品，一般只用来死后赠官，谥号忠介。一个举人出身的官员，得到如此高的政治待遇，明清两代，除了靠平叛卫疆，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再很难找出第二个。可见，当时不仅是百姓，最高统治者皇帝也肯定了海瑞的价值。

海瑞的价值在哪里？我以为是在腐败而畸形的政治场里，他用不近人情的行为，对自己近于严酷的要求，在一团漆黑中发出灼灼的道德光芒。夜越黑，一豆之火就显得越明亮。如果在一个现代政治体制内，固然不允许官员贪墨，但也要保证恪尽职守的官员过着富足的、有尊严的生活。你很难美英这些西方国家的部长级官员，日子过得比

普通的中产阶层还差。如果一个清廉的、尽职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贪污横行一样，都是一种变态的政治。

第38节：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2)

在明朝中后期变态的政治生态中，海瑞自己种菜，自己老婆织布，不受一分钱的礼物，冒死直谏皇帝，等等这一切行为，除了反衬时政的隳坏和同僚的不堪外，也仅仅成就了他本人道德标杆的光辉形象。越是腐败的年代，越需要这样的模范人物，因为他太稀缺了，太不容易了。

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海瑞只能成为挂在墙上做摆设的葫芦，不可能践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整个大明朝文官集团通行的运转规则，不可能有海瑞一展平生才学的空间。

嘉靖死后，海瑞从大牢里放出来。因为他直谏皇帝那惊天动地的一举，已经在朝野树立了极好的公关形象，从此很少有人敢直接打压海瑞，他官运亨通是自然的事情，这样的人不升官，有司和朝廷是要受到舆论压力的。

从嘉靖驾崩，到隆庆三年，短短三年时间，他从一个正六品的主事，升到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考虑他连进士资格都没有，说是坐火箭也不为过。而且，他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应天十府--成为南京周边包括苏州、松江、常州等最富庶地区的最高长官，掌握的实权。可他在这短暂的掌实权期间，得罪了既得利益者，搞得鸡飞狗跳，没法干下去。

海瑞到应天后，干的事情对朝廷，对百姓都是大有好处的。比如他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地主，说明他看到了明朝中叶后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但这类矛盾解决起来何其难也，能兼并土地的大地主谁是等闲之辈，哪个在官场没有靠山？抑制土地兼并他首先拿松江府的徐阶开刀，而徐阶是他的恩公，救过他的命，此时已罢相在家养老。不分亲疏恩怨按章办事固然是很好的政治品格，但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如此难免落下忘恩的非议。而且海瑞办事过于刚硬操切，自然会带来负面效益，比如南直隶的富豪害怕海瑞，携带家财逃到外面去

了，本地的经济会因此凋敝，而你海瑞不可能把手升到其他的省。而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很复杂，很多是小户为了合理避税，自愿名义上将自家田地归于大户所有--因为家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免税，名曰"寄田"。田还给小民，小民还得交赋税，更陷入穷困，海瑞又没有能力改变整个明帝国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更有一些刁民，利用海瑞打击豪强的运动，诬告陷害大户人家。这样搞得士大夫阶层怨声载道，而话语权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于是就有言官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皇帝何尝不知道他一心为公，但不能为了海瑞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半年后，又被调任一个闲职。

万历登基后，深谙官场运行规则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会用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海瑞。万历亲政后，和他父亲隆庆一样，很看重海瑞，屡次要召用海瑞，都被内阁大臣想办法阻挡。万历帝对海瑞的器重，我以为是他看透了也恨透了满朝文官的阴阳脸，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私下里为自己牟利手段百出。在他的心中，自己曾经敬畏和仰仗的老师张居正也是这样，教导自己要勤俭要体恤小民，连少年万历想过年放焰火也不允许，可查抄张家发现张居正本人大肆收受贿赂、生活奢靡。在阴阳脸的众官中，只有海瑞自始至终是一张面孔，对自己对别人对皇帝对百姓都这样。尽管海瑞办事有些迂，但在皇帝看来这正是海瑞比其他官员更忠诚的原因。可是设想一下，如果万历真的重用海瑞，按海大人的办事风格，在政坛内引起大风波，皇帝怎么办?说不定还是叶公好龙，为了平衡还会弃用海瑞。

皇帝要召用海瑞，下面阻挡的官员总得给皇帝一个面子，就这样海瑞去世前两年，做了南京右都御史。没实权的他只能对手下的官员严格要求，可人家不能像海老爷那样过日子。一个御史喝酒时请伶人来唱曲，这在当时太正常了，委实算不了什么。可海瑞照着两百多年前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规定，要对这人实行廷杖，这吓坏了南京所有的监察官员，大骂这老头太死脑筋了，如果都按太祖的成法来办

事，当时的皇帝、百官都不合格，都要受处罚，于是有个御史房寰先发制人，上疏弹劾海瑞。海瑞因此乞休未被批准，直到辞世。

海瑞这样的官员，哪怕皇帝欣赏他，也不能在政坛有所建树，因为皇帝得依靠更多的文官来维持帝国运转，最高统治者想用而不能用，这何止是海瑞个人的悲剧。道德是救不了国的，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评价海瑞"不过是一个正统的、严格的儒家信徒，他要求其下属像他一样厉行俭朴。""这里既非贬低一个正直之士，亦非宽免官员腐败，而是强调制度的缺陷在明代后期已经变得日益严重，道德重建已无力回天。"

死后的海瑞享有大名，四百多年来他成为清官的代名词，不同时期屡屡被赞美被怀念被争论。当人们还不能平静地对待海瑞时，只能说明政治生态和海瑞在世时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第39节：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万历十五年还发生一件对后世产生恶劣影响的事，皇帝用私人武装去干涉司法。

尽管在帝制时代，朕即法律，皇帝言出法随。但在明朝，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程序，严格地按照《大明律》审判，皇帝不能随随便便干涉个案。因此皇帝办事很不方便，碰到那些较真的官员给万岁爷讲程序、讲规矩，皇帝还真没办法。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俩人给自己留下一个后门，先后组建了锦衣卫和东厂，派自己的私人，比如太监去管理，这些人只听命皇帝本人，可以自行侦缉、逮捕人犯，关进不由刑部控制的诏狱。但这类案子一般比较特殊，大多数案子还得交刑部等法司处理，锦衣卫和东厂不得干涉。

这一年十一月，大兴县县令王偕得罪了太常寺。今天的北京大兴县和明朝的大兴县名虽同而管辖地域不一样。明朝的北京城城内由两个县管辖：大兴和宛平。大兴县衙在今天的东城区，现在做了东城公安分局的办公场所。至今还有条胡同叫"大兴胡同"，笔者曾在这个胡同一个大院里住过三年，据说那个大院是明朝大兴县官员的私邸，也许这位王偕老爷和他的妻妾就在里面住过。县令在外地是百里侯，威风凛凛，可在京城，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官。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演员--乐舞生放肆，被王县令给打了几鞭子。当时的伶人地位是很低的，可是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些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朝廷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卿是正三品。王县令的鞭子虽打在几个演员的屁股上，却伤到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这不就等于小小的地方官敢藐视朝廷大员的权威么？太常寺控告王县令，罪名很好找，说他破坏朝廷的祭祀大典，这个帽子很吓人，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审讯。这本是件很小的案子，可万历帝听说后，派两名锦衣卫校尉去当堂听审，而且要求详细记录。--

这就是不放心刑部审理，派人干涉司法。刑部的文官们当然不干，但又不能公开驳皇帝的面子。尚书李世达先推托，说人犯、证人还没到齐，延迟到明天审理。心想这一折腾，皇帝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来听审了。可万历帝也很倔，第二天又让两个校尉来了，刑部巡风主事孙承荣说祖制没有锦衣卫校尉听刑部审案的先例，干脆直接拒绝。校尉大怒回宫向皇帝添枝加叶地禀报，皇帝很生气，下旨要将此案移送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并责问刑部，说你们如果秉公审案，没有私弊为什么怕听记？--这是强词夺理，刑部官员所争是维护独立审判的制度。

孙承荣被罚俸，尚书李世达上疏谢罪，皇帝也不再坚持。事情本来平息了，可刑部的都给事中--监察局长认为孙主事被处罚不公平，上疏说锦衣卫校尉自行侦缉不可施于部院，且听记非祖制。皇帝说刑部严尚书时允许校尉听审，那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时站立一边，不是听记。--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不过是几个法警，和听审记录有本质不同。这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反而激怒了皇帝的牛脾气，坚持还要校尉听记。其他言官一窝蜂上疏和皇帝争辩，请皇帝尊重祖制。当然，最后是皇帝胜了。

到了万历后期以及熹宗朝，锦衣卫、东厂派人监控刑部审判、干涉司法已成惯例，魏忠贤就是因此才能很方便地害死诸多东林人士。

第40节：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中国人喜欢夸耀汉唐气魄，唐代的强盛，主要是在太宗李世民之治下奠定了基础。"贞观之治"也是除了缥缈的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外，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唐太宗在位时政治如此清明、国力空前强大，史家归功于他的虚心纳谏。在中国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太宗手下有一个敢于直谏的诤臣魏徵，而且也熟悉唐太宗把魏徵喻为一面镜子的故事。

可以说，唐太宗和魏徵之间纳谏和直谏的关系，是中国帝制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唐以后的所有王朝中，读书人动不动就拿唐太宗和魏徵来提醒、要求正在台上的皇帝。历史，在中国人中手中，从来就是现实政治中的资源。而对唐太宗、魏徵这对样板君臣，一般的皇帝尽管做不到，但口中还得对两人的功业和品行进行肯定，若不这样等于公开否定了用以立国的儒家价值观。

而万历帝则不然，十六年（1588）的二月，他从道德的高度否定了李世民和魏徵。他让太监张诚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这本书也是历代帝王治国的宝典之一，问申时行："上问先生，魏徵何如人？"申时行当然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回禀："魏徵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补过拾遗，是个贤臣。"

在太监的转述中，万历帝和申时行开始了"辩论"。他说："魏徵先事李密，后事李建成，又事唐太宗，忘君事仇的人，不是什么贤臣。"

接下来申时行为魏徵辩护，饱读经史的他自然从历史中找论据，说如果用大义来责备魏徵，陛下说得不错。但他最后事唐太宗能尽忠。并举管仲先事齐桓公的政敌，后辅佐桓公一匡天下，孔子称管仲为仁。太祖开国时，刘基等人都是元朝的旧臣。

有理有据说得万历无话可说，于是他接下来否定李世民，说："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唐代"玄武门之变"，武则天事

太宗、高宗父子的史实后人皆知，这下申时行只得说，唐太宗于伦理又亏，而且闱门也多惭德，但虚心纳谏为帝王盛美之事，所以后人称赞。他顺便给万历送上一顶高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家法是最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当以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意思是说唐太宗既然不行，陛下就应该超越他。万历能否定唐太宗，却不能否定自己的老祖宗朱元璋。不愧是状元宰相！

最后，万历帝坚持自己对唐太宗、魏徵的评价，经筵中停讲了《贞观政要》。

我们不能将万历、申时行之间的辩论看成一场普通的历史人物评价，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万历帝否定这两个公认的样板君臣，大有深意。因为他已经被群臣蜂拥而至的直谏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些文臣俨然以魏徵自居，当然要求万历帝学习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万历帝干脆从道德上否定这二人，让群臣的历史武器失去光泽。

本来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历史观就多矛盾之处，从里面谁都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答案。当年李世民也烦透了魏徵，曾经说过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魏徵死后将人家的坟墓捣毁，直到征高丽失败，才又想起魏徵直谏的好处来。李世民的政治人格战胜了普通人性，大我胜小我，为了大唐的政治利益，他个人忍受了魏徵带来的不痛快，并不是他真心喜欢魏徵。万历帝当然也很聪明，但从帝王的职业标准来看，他远不如李世民。

第41节：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

不管万历帝你怎样隐居深宫，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否定直谏纳谏的样板魏徵、唐太宗君臣，众位文臣依然不怕罢官，不怕廷杖，不怕杀头，上疏直谏皇帝，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中国人大多 知道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是何等的刻薄。万历十七年（1590）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臣子上疏骂万历帝之狠，一点也不亚于海刚峰。

这位老兄叫雒于仁，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明史。职官志》说："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评事是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复核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是给事中、御史这些言官的分内事，评事上书谴责皇帝有"出位"的嫌疑，即多管闲事。

在这份《恭进四箴疏》中，雒于仁毫不客气指出皇帝的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年是万历十七年，皇帝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照理说正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可自从张居正死后，憋了一口气的皇帝清算完他这位首傅帝师，就开始逃避政务，雒于仁说他当官一年多，才朝见皇帝三回。--他应该满足了，当时万历尚是壮年，还不算太懒，一个七品官一年还能见三回皇帝。后来的万历更是懒得出奇，三品以上的高官一年到头都不能睹圣颜一面。

雒说在外面闻见的理由是皇帝身体有恙，而我知道皇帝致病是由原因的。雒于仁接着分析："臣听说嗜酒就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就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陛下每天面前摆着美味佳肴，沉溺于美酒之中，白天喝还不满足，持续到深夜，这就是病在嗜酒；宠爱十俊这类太监以开启佞幸之门，溺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摈弃忠直之士，太子之位久悬不决，这就是病在恋色；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

帛，有所进献则罢了，无所进献就怒斥，李沂（一个未进献的太监）被拷打的伤还没好，张鲸进献的贿赂又接受了，这便是病在贪财；今日拷打宫女，明天鞭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死在杖下，又心里痛恨直言敢谏的大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一经罢黜，就再不让人复官还朝，这就是病在尚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能是药石可以医治的？！"

这简直把皇帝说成一无是处的混蛋了，最后雒于仁还搬出祖宗社稷警示皇帝："陛下独不思忠直之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陛下的左右，却有利于祖宗社稷。"最后表了个态，说明自己是为大明朝为皇帝才敢说逆耳忠言："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使立刻杀掉臣，臣虽死犹生。"--大多数文臣喜欢摆这种矫情的pose，皇帝真听取你的意见，还杀你干什么？

试想一下，别说对皇帝，一个小单位里今天谁敢这样对上司说话？

雒于仁这份火药味特浓的"炮弹"送进宫里，皇帝看后的震怒可想而知，可正好碰到岁末要过年，简直让皇帝新年里添堵。大过年的，不便处罚他，万历将奏折留了十天。过完年万历帝准备给这位骨鲠之臣算账了，他召见申时行等内阁辅臣，把雒于仁的奏章给他们看完后，替自己辩驳一番，然后说要重惩这位放肆的臣子。

《明神宗实录》记载的皇帝言语多未经加工，所以有很多口语，和今天的白话几乎没什么差别，笔者直接引用这段话。皇帝给众内阁大臣诉苦道："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们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

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们将这本去票拟重处！"看完这段话，觉得当皇帝的也满腹委屈。

此时首辅最难做，他不能和皇帝对着干，但如果不为这位直臣求情，传出去后将惹起物议纷纷。于是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说："这个奏章不能发到外廷，否则的话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对雒宽容，臣等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算了。"万历帝表示同意。不久雒于仁借病辞职。

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因为如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此之前，无论上疏内容如何狂悖，皇帝如何生气，但奏折的内容必须发给台谏官员讨论，那么公道自在人心，这对皇帝也是个约束。而从此后，皇帝将奏折留中，无限期扣押下来不予处理成为惯例。

朝廷多的是雒于仁这样的臣子，当皇帝的再怎样重处，还有人跟着后来提意见，如果动辄生气那就有生不完的气，渐渐地万历帝修炼出了油盐不进的脾气。

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万历帝当皇帝年岁多了以后，习知人情。每见到台省上来的条陈，看两眼就说"这是老套子！"即使有臣子直言指责，全不动怒，很平静地说："这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许多文臣叹服皇帝的宽宏大量，而吏部尚书宋纁听到后大为揪心地说：对时事得失，言官做过激的评论，正要皇帝动心。宁愿皇帝对言官动怒，毕竟说明皇帝还有儆省。若一概置之不理，就如痿痹的疾病，全无痛痒，无药可医。

这位宋尚书很有先见之明，他说这番话，大约是雒于仁骂皇帝以后两年的事情。万历帝到了晚年，再来几个雒于仁这样的奏疏，也惹不怒他了，皇帝和他统治的帝国，真的得了无药可医的癌症。

第42节：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姜应麟于万历十四年，上疏请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太子，惹得龙颜大怒，被贬斥。当时朝廷许多官员上疏替姜应麟说情，其中包括礼部尚书沈鲤（字仲化，河南归德人）。万历帝看到朝野的舆论不利于自己，于是敷衍两句，说皇长子年纪小，身体弱，等两三年大一点再说。

这样的托辞，着实能看出皇帝的偏心。那时候医学水平不发达，即使是皇家，也未必能让子孙平平安安长大，但以此来推迟册立东宫，让人寒心。难道年龄大几岁，就能保证顺利继承皇位？朱元璋册立的太子朱标，以及万历的爷爷嘉靖最初册立的太子都在盛年时，死在父亲的前面。册立东宫无非是安定人心，杜绝了不必要的政治争斗，至于太子可能出现的病灾，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而且并不妨碍帝位的传承。即使太子夭折，自有其他皇子按长幼秩序递补。

臣子们把皇帝这句话当真了，所谓君无戏言。到了十六年九月，沈鲤上疏提醒皇上，陛下两年前所说的"俟二、三年"，现在期满了，请履行诺言。在皇上看来，这简直就等于年底债主拿着债务人的欠条，上门收账一样，大伤自尊，当然不高兴，太监也趁机说沈鲤的坏话。沈尚书被皇帝斥责一番，按照当年官员对皇上表示不满的流行方式：提出辞呈。照理这样为国本而争的大臣，应当被挽留，可首辅申时行讨厌沈鲤太耿直，不依附自己，在拟票时同意了沈的辞职申请。--一般说来，首辅草拟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诏书，事前应当和皇帝取得一致意见，皇帝照准，否则就显出君相太不和谐了，拟票的阁臣也很没面子。

怎知皇帝虽然不喜欢沈鲤这次请册立东宫的提议，但对他本人一直十分欣赏，看到申时行所拟的票，大惑不解地说：沈尚书是个好官，奈何让他离开？并且派太监上沈鲤家，暗示他不要辞职，皇帝很

喜欢他。可这个人死倔死倔的，认为自己没错，皇帝要留自己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因此说宫中太监的话不可信，坚持辞官回家。--他应当知道，皇帝如果下旨挽留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这何其难也。但沈鲤尽管常常惹皇帝不高兴，不知为什么一直投皇帝的缘法，回老家后皇帝一直念叨他，到二十九年拜大学士，入阁当了次辅。看来万历帝在对大臣品行才能的判断上，眼力不错。

皇帝不喜欢长子，但又不能明白地提出让郑妃所生的第三子即位，这不但违背了祖制，将会引起惊天的风波，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母亲慈圣太后还在，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大凡母亲，往往不喜欢和儿子感情太过亲密的儿媳妇，像郑妃这样的人在老太太看来，几乎就是狐媚之人，而生育长孙的恭妃是自己身边的服务员出身，更靠得住。有一次她对儿子万历帝说，外廷议论该早立老大为太子，你如何打发老大？万历帝说，老大是都人（宫女）的儿子。意思是说他母亲的身份太低微。老太太说：你不也是都人的儿子么？母以子贵，哪分什么贵贱等级？这让万历帝无话可说，因为他母亲也是宫女出身，照他的理由，那么自己也没资格当皇帝。

因此，皇帝只能拖下去，拖一天是一天，心想没准会出现什么转机。因为名分一定，要改动起来就太难了。

第43节：较劲变成了赌气

较劲变成了赌气

沈鲤的去位，并不能让册立东宫的君臣矛盾得到解决。状元宰相申时行是个最会搞平衡的高手，他自然不会像一般大臣那样直白地逆龙鳞，得瞅准皇帝高兴的时候进言。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万历帝在宫内召见申时行等内阁大臣，并让皇长子和皇三子出来和各位先生见面。--万历的次子出生不久就夭折，郑贵妃所生的三子实则就是次子，如果长子无份于储位，那就非他莫属。好比现在几位高级职员上老板家拜年，看到老板的儿女，照例要夸赞一番，申时行趁机恭维皇长子是块美玉，要早加雕琢，使之成器，并请皇帝早定册立太子大计。这种场合下，万历帝就算不高兴，也不能发作，耐心地向大臣们解释自己已有主意，并替郑贵妃撇清，说她也劝自己早立储君。--显然，只要早立东宫，只可能是长子。

但这仍然是皇帝在各位大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委以虚蛇，他不甘心就此顺顺当当让长子当了太子。不久阁臣王锡爵、许国、吏部尚书宋纁先后上疏请皇上尽快选定接班人，并以引病辞职来施加压力。这些人可都是朝廷柱石，远非七品言官那样好打发。皇帝不得不表明态度，传旨内阁说，册立储君，按伦序已定，再等一段时间，侯旨意举行，到时候还得有劳各位爱卿决策。--这道旨意明确了按长幼伦序，但就是不直说将立长子为太子。

这道旨意刚下，第二天礼部尚书于慎行（字可远，山东东阿人）便上奏疏说，皇长子册立拖延至今，册立东宫的大事，是臣礼部的职掌，如果臣等不言，那便是有罪，请速决大计。这下把万历帝惹毛了，心想昨天我刚刚许诺按长幼伦序，你立刻上疏催促我，这不存心和老子过不去么？于是降旨说于慎行要挟君王，怀疑圣上，淆乱国本，难逃罪责，扣发薪水三个月。

堂堂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礼部尚书被罚，内阁大臣不能坐视不管。当时内阁四大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南直隶的同乡全在家休病假，只剩下资历最浅的王家屏（字忠伯，山西大同府山阴县人）在守摊，他替于尚书求情，皇帝得给他一个面子呀，派太监告诉他：如果廷臣不再上奏烦扰，准备明年举行册立东宫的大礼。若再有人提这事，那就等到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此年皇长子虚岁九岁。

这就等于万历帝拿自己朱家皇位传承的大事，和廷臣们赌气。你们越催我，老子就越推迟，看你怎么办。皇帝，发起了小孩子脾气。

王家屏这位老西可不像申时行那样圆滑，他知道皇帝是缓兵之计，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出尔反尔，便说口传圣谕，难以为凭，请皇帝为此颁诏天下，明示来年册立，而且当仁不让地为皇帝拟好了诏书的草稿。这摆明不相信皇上，让皇帝写保证书，皇上能高兴么，自然不答应这个要求。王家屏于是干脆把皇帝的口头保证告诉外廷群臣，心想这下皇上你不写保证书，我让大伙儿都来作证，到时休想抵赖。

皇帝本来是想把私下里把阁臣哄一哄，到时候再说。这下痛恨王家屏把自己架到炉火上烧烤，责问他为什么把给你一人说的话泄漏。王家屏回答得非常堂皇：如此事关祖宗社稷大事，哪能臣一人能定下来的？皇上又重罚了许多上疏请求册立的臣子，臣如果不能将皇帝许诺明年册立的德音传达给众臣，来冰释大伙的疑惑，就会被众人误解诋毁。--意思是说我这样也是为了大明江山，不得已为之。

碰到这样的大臣，皇帝还真没办法。

第44节：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当首辅，采取的是走钢丝、搞平衡的为政方式。在清算张居正时，万历帝和多数廷臣的态度一致，因此申时行还能玩得转。可到了争国本时，皇帝和多数廷臣对立，势若水火，以"调和鼎镬"为己任的宰相如何能调和得了？首辅变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众臣们都还惦记着前一年皇帝说过二十年春季举行册立大典的话，到了万历十九年八月，看到还没啥动静，知道皇帝又在糊弄兄弟们了，于是大伙儿想提醒皇帝信守诺言，但害怕话说得太直惹怒皇帝。一位工部主事--六品小官张有德，想出一招巧妙地提起册立这个皇帝最烦的话题。他上疏请示如何准备册立的仪注，这理由很充分，因为重大典礼的仪注都归工部准备，当然得事先造预算、置办设备，怎能临渴掘井。万历帝便说臣工又故意用册立的话题烦扰他，于是就以上年的旨意为由：若有人再提此事，册立就往后推迟。命令册立再延期一年，并将张主事罚俸。

此时王锡爵已经以老母在堂需要奉养为由，告假离开了这个是非窝。还剩下三位内阁大臣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联名上疏请皇帝来年春天册立太子。当时申时行生病告假，但次辅许国将他的名字列在首位。神宗看完奏疏很不高兴，问申时行，你怎么也和那些激扰的小臣一样？申时行便给皇帝写了一道密奏解释说："臣当时告假，事先不知道这事，圣上主意已定，张有德不明大计，望皇上亲自裁定，不要因小臣误了大典。"皇帝一看，觉得首辅体谅自己，很高兴，将密奏和其他奏本一起交给礼部。--皇帝批示臣下的奏疏，一定要交给分管部门归档保管，但密奏不在此列。万历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他此举也许故意让外面的廷臣看看首辅是何等地体谅皇帝，你们得以他为榜样。

这下可给申时行带来莫大的麻烦。以找茬为职业的礼科给事中罗大纮如获至宝，他上疏弹劾申时行，"申时行表面上附和众臣请求册立之议，暗中却与宫内交通合谋。"这就等于说堂堂首辅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那时候小臣特别是言官选择弹劾对象，官越大越过瘾，如果大官被自己弹劾辞职了，那么就在官场上扬名立万了；如果因此受到处罚，也就成为不畏权势的英雄人物。一个用钱买了个中书舍人--秘书局秘书的安徽人黄正宾，正想找件大事博出位，来争取被官场主流接纳，因为在重科举的明代，捐官者根本被人瞧不起。于是他也跟着上疏诋毁申时行。万历帝便将黄正宾廷杖，与罗大纮一起贬斥为民，这一赌他赌输了，买官的银子算是白花了，人家科举出身的被斥为民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受够了夹板气的申时行心灰意冷。他处在这个位置，不能像小臣一样直接和皇帝对立，小臣这样做可以邀名买直，而首辅处理不好和皇帝关系，那朝政就会乱套；可作为文官集团的领头人，他又不能为了取悦皇帝，而背叛这个集团，否则将身败名裂，连子孙也跟着挨骂。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挂冠而去，数次上疏请求退休，终于被批准。而擅作主张将申时行列在联名奏疏首位的内阁二把手许国，也没法呆下去了，请求退休回家。现在，内阁中的老人只剩下王家屏做了首辅，另外补充了张位、赵志皋两位新人入阁。因争国本使内阁大换血，其引发的政治地震不亚于现代国家内阁集体辞职。

缺了太极拳高手申时行的内阁，更没办法处理越来越剧烈的君臣矛盾。

第45节：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因争国本引发的君臣对峙，我以为到了后来，对万历帝而言，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让大儿子或是三儿子当皇帝了，他明白长子继承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结局。但他不能轻易向文臣们地头，你想呀，堂堂的皇上在文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就范，对于万历帝这样一个敏感而固执的人来说，多么痛苦。所以到了后来，事态越来越演变为赌气而较劲，一根筋的皇帝遇上一根筋的群臣们，谁也不愿意轻易认输。

僵局总得需要人打破，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的迂回战术已经碰壁了，但有人再想出新招。二十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礼部监察局局长）李献可偕同六科言官向皇帝上疏建议"豫教元子。"也就是说让皇长子正式出阁读书。皇子读书可不像普通子弟上学，随便找个私塾就行，太子和一般皇子地位不一样，其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太子，那么请的师傅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教导他的不仅仅是识字明理，而重点是教导怎样做一个皇帝，也就是说，对太子的教育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二为一，就如当年万历帝自己被立为储君后，他老爸找了十几位品学兼优的大臣组成教师团。

李献可的奏疏说得委婉而有理，他认为皇长子十一岁了，豫教的典礼应当在早春举行。内廷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也有近侍辅导，但内廷的幽闭比不上外朝的清肃；内臣的忠臣比不上少师、少保的尊严。

万历帝是何等精明的人，一下子就看出李献可暗藏的玄机，如果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就必定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就是等于宣布他是储君了。

哼哼，小小的花招哪瞒得过朕？万历帝不能直接斥责李献可的奏疏荒谬，因为人家说得太堂皇了。皇帝便挑出一个笔误，李的奏疏中将"弘治"年号写成"弘洪"，照理说，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将先

帝的年号写错，确实不应该。于是批示，以"侮君"的罪名将李献可降一级，调到京外，其他跟着上疏的言官每人扣发半年工资。

这处罚需要内阁去办理，可首辅王家屏可不像申时行，他认为李献可做得没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把皇帝这道批示驳回。这实在太不给万岁爷的面子了。在唐宋时，明确设立了宰相，并规定皇帝的诏书必须有宰相副署才能生效，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宰相）不能为敕。宋太宗时想任命一个官员，宰相不副署，他都不能堂堂正正用朱笔批示，只能"墨敕斜封"违法任命。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内阁名义上只是皇帝顾问，自然没有副署的法定权力，但嘉靖以后，内阁权力日大，顾问变成了真宰相，但敢于这样驳回皇帝批示的，还很罕见。而且王家屏随后托病请假，不理政务。

紧接着，大学士赵志皋、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右给事中舒弘绪、陈尚象、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以及十几位御史、给事中争先恐后上疏为李献可鸣不平，尤其是孟养浩更是指责皇帝不守信用，说话不算话，是罪一人而失去天下人之心。这就等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叫骂了，万历帝面对这样的文臣，只剩下一个办法应对：廷杖。孟养浩被廷杖后罢职为民，其他官员各有处罚。

第46节：皇帝也搞迂回战术

皇帝也搞迂回战术

言官们激烈地反对自己，万历帝并不惊奇，他伤心的是作为首辅的王家屏也动辄撂挑子，给自己难堪，于是派太监上王家训斥他不顾大局，让他尽快回朝办公。可驴脾气的王家屏就是不理皇帝的要求，一再上疏请求退休。万历帝没办法，总不能按着牛头强迫其河水，只得照准。在细节上万历帝做得比较漂亮，虽然恼火王家屏的行为，但还是派官员用公费护送他回山西老家。

只要进了内阁，就得代表文官集团说话，否则就可能有张居正那样的下场，因此被皇帝特恩批准不经廷推--即吏部主持公开讨论候选人进内阁的次辅张位，想到的不是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而是和众廷臣保持一致，照样三番五次上疏要求万历帝早日册封，行豫教礼。

万历帝真是伤心，提拔的人没一个为自己排忧解难，太令人失望了，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锡爵，坐上了他同年兼同乡申时行坐过的首辅位子。王锡爵敢于担当，办事果断，但他低估了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

因为皇帝曾答应在二十一年（1593）举行册立东宫大典，深知万历帝在这一问题容易反复的王锡爵，写了封密奏给皇帝，敦促此事。谁知皇帝回复他的手谕，耍了一个花样，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解决办法。

所谓"待嫡"，就是说根据祖制，有皇后所生的嫡子则立嫡，皇后没有生育儿子就立长子。如果现在将长子立为太子，日后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不如先将皇长子和三子、五子（次子、四子已夭折）一起封为藩王。如果以后皇后生不出儿子，自然由长子承继大位。

因为当时皇后才三十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皇帝这次"迂回战术"看起来能自圆其说，但王锡爵一看皇帝的手谕，大为惊恐。他太了解皇帝这样说无非是找托辞，压根儿就是他不愿意痛痛快快让老大做

太子。万历帝和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这也很正常，和皇后的结合，多是"包办婚姻"，所选择的皇后一般是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要母仪天下么，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比女性魅力，恐怕皇后是最没有竞争力的，皇帝自然不喜欢和这样的大老婆睡觉。明朝朱元璋以后，皇后生育儿子的只有孝宗的张后，所生的是那个荒唐透顶的正德皇帝。孝宗是个遵循"一夫一妻"的好丈夫，不近其他女色。这说起来是个好品德，但同样不免被后来的文臣议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祖宗社稷不负责任。如果孝宗多临幸其他嫔妃，就可能多生几个儿子。如此的话即使后来正德死后，没有儿子，也有亲弟弟即位，不至于将远在湖北的藩王儿子--后来的嘉靖接到北京坐龙椅，也就不会有"大礼议"那档子搅得朝局乱成一团的事情了。反正，皇帝怎样做，文臣都有说辞。

于是，"三王并封"的圣谕颁发到礼部，而整个朝廷立刻像炸了窝一样！

王锡爵为官以来，以刚直不阿著称。当年因张居正夺情事件，翰林吴中行、赵用贤被廷杖，正执掌翰林院的王锡爵找到权势赫赫的张居正，为自己的学生求情。此番皇帝出了个"待嫡"的馊主意，他竟然没能尽力反对，不用说和刚离职的首辅王家屏相比，就是他那位同年老乡申时行，看起来柔顺，而在立太子这件大事上毫不含糊，宁愿辞官也不无原则地顺从万历帝。大约王锡爵看到万历帝为册立东宫的大事，连续两任首辅都不为皇帝说话，自己再那样干，太伤皇帝面子了，不如先顺从皇帝，日后再慢慢斡旋。

廷臣们本来对皇帝册立东宫之事一拖再拖很不满，这下竟然等出了这样的结果。以往皇帝只是搪塞，推迟册立，但总给个时间表，现在竟然要将皇长子封为普通的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儿子，这就更没谱了。在大臣们看来，大伙儿被皇帝当猴耍了，于是舆情激荡，反对声不绝入耳。

光禄寺丞（从六品）朱维京上疏说皇帝"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邢科给事中王如坚的上疏更加直白激烈，他历数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次失信，拖到今天，现在竟然要待嫡，质问皇帝："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并且讽刺皇帝，说古代帝王后宫没有偏爱，因此皇后多嗣，我朝以来，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而且拿万历帝本人举例，因为万历也是庶出，王如坚反问万历帝，当年陛下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为什么没有和潞王（万历的同母弟弟）一起册封为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子呢？--那言外之意是：皇帝自己不喜欢皇后，所以才没有嫡子，如果多和皇后过夫妻生活，嫡子也许早生了，还要等到立皇后十五年后再生儿子？这几乎是指责皇帝的私生活了。皇帝没办法，处罚了两位廷臣后，后来还下了道旨意解释自己和皇后的关系好起来了，说去年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何朕在一起了。意思是说可以过夫妻生活了，生嫡子不是没可能。连和皇后之间的夫妻私生活也要向大臣说明，恐怕只有明代的皇帝了。

王锡爵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他不能阻止皇帝，开始他还为自己辩护，翰林院的庶吉士李胜芳一番分析让他感觉到，如果附和皇帝的待嫡、并封，几乎是在自掘坟墓。李胜芳理解王锡爵在搞迂回，巧借三王并封，实则想促使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但他分析道，一旦并封，册立就会更加推迟。先生在任时难以促成，一旦离开朝廷，别人当了首相，能像先生那样所愿那样促成皇长子成为东宫么？一旦不能，先生岂不是成千古罪人？王锡爵还在为自己解释，说当初给皇帝的密信中催促过皇帝册立，意思是说自己责任尽到了，以后出现变故也没办法。李胜芳反问他，这件事外面的人谁能知道？到那时天子还会将你的密信公布天下。--意思是说如果事有不测，你的黑锅背定了。王锡爵的门生更是提醒老师，如此做恐怕有灭族之祸。这用不着多解释，如果万历帝以后不立长子而立老三，必定引发政局动荡不安，所有的人都会归罪于当时的首辅王锡爵；如果拖

到以后皇长子终于继位，当了皇帝的他会恨王锡爵当年支持父皇"待嫡"、"并封"，那后代的祸患恐怕不亚于张居正。

看到这一点，王锡爵感觉到自己的危机，为了一世清名和子孙后代，他也来了个大转折，明确表示反对皇帝的提议。

第47节：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连开始替自己排忧解难的首辅王锡爵最后也反对自己，这下让万历帝意识到，固执己见，想要降伏整个文官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

皇帝终于让步，收回"待嫡"、"三王并封"的成命。但事已至此，万历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册立长子为太子，还在想出一切办法拖延，憋了一肚子气的他就是不想让文臣们赢得轻松。

就如挤牙膏、压弹簧一样，在大臣的压力下，皇帝一步步妥协。二十二年，虚岁十三的皇长子朱常洛才得以出阁接受正是教育。二十九年十月，历尽波折，终于册立朱长洛为东宫太子，此时，他已经虚岁二十了。有了太子的名分，才能娶老婆，册立后第二年举行大婚，在寻常人家，当时也算晚婚了。因为天子家不如寻常百姓，普通的藩王和太子娶妻，那礼仪是差别很大的，名分不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到了这时候，皇帝没法拖下去了，因为老大没有太子的名分，不能结婚；他疼爱的皇三子不可能在长兄面前结婚。他所有的皇子人生大事都会被耽误。

国本之争总算有了结果，朱常洛的教育和人生大事被耽误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整个国本之争，导致了君臣严重对立，相互不信任，万历帝对文官更加的不满甚至是痛恨。他晚年的懒惰，不见朝臣，固然和身体多病有关。但如果多加调养不至于常年没法接见大臣，根本原因是他烦这帮臣子。

朱常洛被册立后，"争国本"的风波并未平息，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岌岌可危小心谨慎，郑妃母子虎视眈眈心怀鬼胎，皇帝心里不痛快在寻求逃避，廷臣们还在担心出现变故。后来的"梃击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朱常洛的短命，儿子熹宗从小失教只能对木匠活感兴趣，都和

"争国本"的大风波有关系。可以说，"争国本"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文臣们在这场战争中赢了，但是一场惨胜，君臣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做赌注。

现在看来，立谁当太子似乎是家事，但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是最大的国事，文臣们焉能坐视？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整个帝国皇帝只是法人代表，一大帮管理人员--文官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董事长和管理人员必定有利益间的矛盾，在"争国本"的问题上，与其说是破坏制度和捍卫制度之争，不如说是决策权之争，争夺重大问题上谁的话最管用。看起来皇帝在权力上有绝对优势，可相对的是文臣们有道义的绝对优势。在道德治国的明朝，道义优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没有公允独立的裁判机制和和平稳定的博弈体系的情况下，这种争斗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康熙帝能两废太子，搞出一种立密诏等驾崩后才宣读这种完全皇帝说了算的继承制度？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势异也，和明朝相比，清朝皇帝独裁专制得更彻底，文臣完全奴化，哪还敢像明朝那样和皇帝"争国本"？明朝君臣是在争谁更有发言权，清朝连君臣相争的土壤都铲除了。

援朝之战打响了

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闹家务事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打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是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加上万历帝，当时东亚地区是三大政治领袖并存，怎知道笑到最后的是当时看起来力量最弱的努尔哈赤。

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该国数千年传统的国策，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西向。而且日本每一次在国力迅速上升的历史转折点，一定要挑衅他们文化上的老师--中国，引发战争，且战争总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上一次和中国过招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为百济、新罗和高句

丽，唐朝和新罗联军与日本和百济的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当时日本刚经过"大化革新"，以为有力量和唐朝抗衡，而唐朝经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二者力量相差太大。此役日军惨败，明白了两国的力量悬殊，退回列岛老老实实呆了900余年。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结束了各大名相互攻伐不已的战国时代，兵强马壮，又开始做起了西进大陆的迷梦。而此时明朝各种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国力不如洪武、永乐年间，早在嘉靖年间，日本列岛的流浪武士和中国海盗纠集起来，就可以横行中国东南，使日本有轻视明朝之心。

侵略中国大陆，必须先攻占朝鲜半岛作为跳板，这几乎是日本扩张计划的必由路径。当时丰臣秀吉计划攻下北京作为天皇的首都，而自己的指挥中心移驻到中国宁波，宁波是当时当时亚洲第一大港、国际贸易中心。这个家奴出身的枭雄要占据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胃口不可谓不大。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三员骁将，统兵二十万，于四月十三日在朝鲜南部的釜山港登陆，兵分三路，直指王京（今天的首尔）。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而且是倾全国之力。朝鲜承平日久，靠着明朝这棵大树，根本不修战备，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下，不堪一击。五月，王京失陷，国王逃到平壤，两位王子被俘虏。日本军趁胜北上，又于六月十五日攻占了平壤，朝鲜国王退到了中朝边境的义州，亡国在即，朝鲜国王一次次派使臣到天朝乞师，而且做好了请求内附的准备--即进入中国境内建立流亡政权。战火很快就要烧到鸭绿江，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战局出现了一丝转机，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利用龟甲船重创日本海军，因此日军的粮草、兵力补充受到了影响，不得不暂时驻扎在平壤休整。

明朝接到朝鲜国王的求援时，自己正在打一场大仗。宁夏的蒙古鞑靼部落哱拜叛乱，波及到整个西北，帝国的精兵强将差不多全派到

西北去平叛了。

第48节：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明帝国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困难，也必须出兵支援朝鲜国。原因有二：

一是出于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责权关系。明朝的十数个藩属国中，朝鲜对天朝最忠心，大约和明朝皇帝有朝鲜族血统有点关系，朝鲜对明帝国的制度文化也学得最彻底，对朝鲜，明朝皇帝真有自家人的感觉。人家朝贡不断，尊明朝皇帝为老大，老大自然就有责任为藩属国提供军事保护。二是朝鲜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他是大明的东面屏障，朝鲜要是沦于日本人手中，直接就威胁辽东，也就威胁到北京。

这场战争和倭寇骚乱东南沿海不同，倭寇只是图财，抢劫烧杀固然可恨，但政治目的不明确，对大明的国防安全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政府行为，大明焉能旁观？万历帝在处理立太子这类内政时，优柔寡断出尔反尔，但在处理外交、国防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当机立断，派兵入朝参战。

一开始明朝对日本军的凶悍估计不足，两次派出小股部队，统领的军官级别也不高，这几乎是以卵击石。两军甫一交战，统兵的游击史儒在平壤阵亡，第二次交战三千人全军覆没，统兵官祖承训仅以身免。

初战失利，全国震动，万历帝立刻任命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国防部副部长），专门经略对倭战事，在全国广泛募兵征粮。他和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没有战略眼光的书生。这宋应昌是个大忽悠，据文秉的《定陵注略》记载，朝鲜战争刚刚打响时，宋应昌正在山东巡抚任上，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当然要做战争准备。这宋巡抚命令在沿海登州、莱州收购数万枚鸡蛋，别人问他有啥用，他说如果倭寇的船来了，我军扔鸡蛋到他们的船上，船板就会变

滑，倭寇站立不住，将全部被我军擒获。--就这样智力的人，靠吹牛当上了专司抗倭的侍郎，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宋侍郎对自己升官很乐意，但对打仗却害怕，这一点他和尚书石星一拍即合，于是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被提出来了。两位老爷派浙江嘉兴人沈惟敬去日本军营"招抚"，这沈氏一个无赖出身，家中有一个仆人曾经在日本呆过数年，沈惟敬从他那里听到一星半点的日本国情况，便俨然以"东洋通"的面目出现，说丰臣秀吉并无他意，无非想来朝贡大明天子，被朝鲜阻挡，所以举兵入朝。--这样的理由，是一种典型的天朝大国式意淫。可尚书、侍郎竟然相信了，将沈氏委以重任。

沈氏到了平壤，与小西行长会谈。看到明朝已经出兵，日本人觉得一下子吞下朝鲜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便哄骗沈惟敬，提出谈判条件，说如果明朝按兵不动，日军不久将班师，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南全部割让给日本。

这是牺牲朝鲜国的利益换取和平，而且对日本这样的国家，若不显示足够的武力，和谈是没有基础的。因此，日本的谈判要求传到朝廷后，廷议哗然，纷纷认为倭人狡诈多变，决不可信，朝鲜问题，不如速战速决。